

领导参考

Ling dao can kao

二〇一六年第一期 总第11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重点推介

- 01 互联网金融处十字路口
- 02 从习近平考察小岗村看中国政策动向

聚焦中三角

- 04 鄂率先推行国地税一窗服务
- 05 湖南电商扶贫 让“农产品进城”
- 06 生态三峡岸电工程 创绿富双赢

改革探索

- 07 “营改增”为经济注活力
- 08 中国制造业须另创优势
- 10 房地产也迫切需要供给侧改革

经济广角

- 13 2016 中国经济的亮点与难点
- 18 中国经济为何减速？经济学家分析三大原因
- 19 中国经济有韧性结构转型见曙光
- 20 新增就业减 内地经济大隐忧

科教文卫

- 21 中国确定今年深化医改六大重点
- 22 李：深化教育改革激发活力
- 23 两手强化网络知识产权保护
- 24 六省市文交所共建跨区域专家智库

三农问题

- 25 大寨进入“网际网路+”时代

社会观察

- 26 房价要降？调控后的中国楼市现在啥情况
- 27 中国食品安全面临的挑战

综合治理

- 29 习大大大脚解围旧经济
- 30 中国网络治理“再定调”

环球视野

- 32 全球经济未来 10 年发展趋势
- 35 以一带一路重建香港人心
- 37 “东亚奇迹”能否持续？

学术前沿

- 41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届满续租的法律问题
- 45 解读“土地使用权届满续租”

讯息快递

孝感图书馆

互联网金融处十字路口

易宪容 香港《东方日报》2016年4月1日

2013年某互联网金融产品拔地而起，即把中国互联网金融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不仅让支付类互联网金融产品涌现，其他互联网产品瞬间形成（如众筹市场、网贷市场等），更令2013年之后中国互联网金融出现爆炸式增长。

中国互联网金融近年乱象丛生。

中国成了互联网金融茂盛生长最好的土壤，不仅在于内地大力支持和鼓励，且在于所拥有的人力资源优势，令更多人才涌向市场。在短短一、两年里，中国成了互联网金融发展最快、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市场。

在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蓬勃时，我就指出中国互联网金融无论技术渗透度有多高，普惠性有多广泛，肯定就是万变不离其宗。互联网金融的实质是金融，任何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都是对信用的风险定价。若互联网金融的信用基础不通过市场方式来确立，以及有相应制度来保证，互联网金融不可能顺利发展。

中国互联网金融大门这几年打开，惟由于市场信用基础缺乏，致鱼虾齐下，问题涌现。网贷市场最近沉沦，情况就是如此。某网上融资平台一夜之间倒塌，把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推向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

该网上融资平台在中国互联网金融爆炸式增长时成立，即于2014年7月。在短短一年多里，其交易量跃升整个网贷交易平台首位。该平台以各种方式吸引投资者，除承诺保本付息外，还许以高额回报，提供9至14.6%的项目收益率，远高一般银行理财产品利率。到2015年12月，该平台投资用户超过90万人，累计成交金额超过700亿元人民币。可是，该平台闹出违规风波，引起众多问题。

网贷借助“三无”催生

网贷业作为金融行业，不仅要有严格的专业要求及市场准入要求，也要有一套保护投资者的法律与司法制度。政府鼓励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惟各种制度条件没有准备好，网贷行业在无市场准入门槛、无行业标准、无主管机构监管下快速发展，定会造成网贷公司龙蛇混杂，让各种各样的公司，特别是一些高利贷公司和地下钱庄借助于金融创新名义涌入市场，进行不当业务。中国网贷公司在一、两年内发展出2,000多家，与这种“三无”现象有很大关系。

隐性担保助长歪风

该网上融资平台能短时间内发展，不仅利用网贷行业初创时期的“三无”现实，

更重要是借助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完全隐性担保。在内地，无论是银行、股市或保险等各个金融行业，基本上还是获政府隐性担保。

在中国金融市场，若市场出了问题，政府最后会承担责任，因只有政府对互联网金融作出的隐性担保，投资者才会相信该网上融资平台的承诺。政府名义鼓励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其实就是政府对这个行业一种最重要的隐性担保承诺。

未进入大资料时代

在互联网大资料时代，很易识别这种简单的金融违规手法。惟该网上融资平台为何能畅通无阻，一方面在于政府对这类公司的信用进行隐性担保，也在于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根本没有进入真正的大资料时代，这些公司或网贷行业只不过是在作出传统行为时，戴上互联网金融创新的面罩。互联网金融乱象丛生，关键在于没有进入互联网时代。现时所谓的互联网金融只有从浴火中才能重生。

去年中国网贷乱象丛生，令刚兴起的网贷行业目前陷入史无前例的危机。该网上融资平台倒闭，彻底摧毁公众对网贷业的信心，各种项目投资额大减。随着京沪等地开始限制互联网金融公司登记，新上线平台数量急降。今年2月，新上线平台仅27家，但新增问题平台达74家，其中主动停业的平台达32家，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带来巨大阴影，令投资者信心全面丧失。若监管部门推出新规、市场准入制度，严格约束网贷平台业务，更可能是压垮网贷行业或中国互联网金融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正处于一个重大十字路口。在这个重要关头，政府、企业、投资者如何应对，是每一个人都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从习近平考察小岗村看中国政策动向

沈建光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6年4月29日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中国经济与金融市场信息比较混乱，政策方向的讨论也存在比较大争议，这导致了一些奇特的现象：如一季度中国经济开门红，但民间投资增速几乎腰斩；宽松货币政策下，债券违约与取消发行频频出现；去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到“三去”任务中，去杠杆变成了债转股最后的晚餐，去产能又强调企业不破产保就业，去库存也演变成一二线高房价。种种矛盾现象背后，有质疑声音认为，中国政府是否不准备坚持市场决定作用这一原则？改革是否会走回头路？

在笔者看来，近日习近平考察小岗村释放的政策信号，似乎可理顺当前模糊的政策预期。

小岗村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绝对具有历史性的意义。1978年小岗村村民敢为天下先自发开启“包产到户”行动，并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推广到全国，是

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此次习近平考察小岗村，强调“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实际上表达了继续改革的决心。

那么，既然改革方向不会发生转向，如何理解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上述矛盾情况，特别是去产能、去杠杆目标在执行中的弱化？

其实，去年年底笔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揭示三大难点》文章中，提到了五大经济任务虽然谈起来振奋人心，但是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的理想愿景，在实施中多目标难免存在矛盾。如无论是去产能，还是去杠杆，在经济下滑阶段，切实落实必将对增长造成打击，如何又能保6.5%以上的增长？另外，去产能与去杠杆的关键也在于国企改革，到底是做大做强做优，还是引入现代公司治理制度，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国企改革往何处去至今来看仍没有答案。

而在今年3月两会政府工作中，笔者感觉政府已经有了倾向性的态度。在笔者看来，两会传达的信息让诸多矛盾出现了更具有倾向性的处理方式，即在落实当中，稳增长与保就业仍然位居首位，而这就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去产能与去杠杆可能性降低，还是以稳定增长与保就业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正如习近平考察安徽小岗村，在表明改革决心不动摇，又提到对就业的关切，适度扩大总需求，便意味着短期内稳增长要义。

既然根本上改革方向不变，为何短期无法获得突破，甚至存在着看似走回头路的现象？在笔者看来，一个举足轻重的原因便是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周期，即五年一度的党代会十九大在明年召开。很巧合的是，1977年十一大以来，中国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具有较高一致性，每五年一次的党代会前后一年的经济表现情况都要好于党代会的空窗期。这说明，在党内换届之前，各层官员有动力追求更高的经济成就为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政治升迁打下基础。

实际上，关于政治经济周期（Policy business cycle）的研究并非笔者主观臆断，从理论上和实证上国内外学者已有不少成果。例如，国外方面，诺德豪斯（Nordhaus, 1975）提出政治性经济周期的机会主义模型，认为执政者为获得连任，选举前夕采取的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往往成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诱因。希布斯（Hibbs, 1977）提出“党派”（partisan）模型，强调不同政党的执政者拥有不同的宏观经济目标，轮流上台执政会使宏观经济形势呈现出周期性波动。

艾莱斯那（Alesina, 1987）提出理性机会主义模型和理性党派模型，其后对政治经济周期进行了检验。结果1961~1985年期间美国在净转移支付上存在选举周期（1988）；他认为，德国尽管拥有独立的中央银行和保守的财政政策，但仍然存在政治经济周期（1992）；他还得出了18个经合组织国家的货币政策在理性预期条件下存在党派周期等等（1997）。

针对中国政治经济周期，也有大量研究。

如LiYinan（2012）提到党代会与经济周期的关系紧密，党代会前后一年固定资本形成增速处于上升期，其核心在于政治中心化（Political centralization）与经济去中心化（Economic decentralization）；谭之博等（2015）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发现省级信贷投放与固定资产投资都随省委书记和省长的任期呈倒U型变化，转折点在三至四年左右；纪志宏等（2014）发现，银行信贷规模与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年龄呈倒U型关系，信贷规模峰值出现在地方官员54岁左右。

总之，基于诸多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中国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存在一定联系的判断是成立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经济改革决心不动摇是努力方向，而十九大前期，预计短期政策仍倾向于稳增长与保就业为主，在经济企稳尚不牢靠的今年，货币政策仍会保持宽松，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配合高速增长的基础投资方向不变，而更多深度改革只可能在十九大过后才推出。

聚集中三角

鄂率先推行国地税一窗服务

邱保华 《香港商报》2016年4月8日

在国内率先“推行办税省内通办，实现‘前台一家受理、后台分别处理、限时办结反馈’的服务模式，加强税务干部平时考核、建立数字管理制度体系”。

湖北省国税局和省地税局负责人介绍，6月底前，湖北力争实现“一窗、一人、一机、一屏”，并做到“七个统一”，即统一办税环境、统一业务流程、统一岗位职责、统一平台运行、统一人员管理、统一培训宣传、统一绩效考评，提高国地税联合办税服务质量和水平。

湖北省国家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国钧表示，5月1日起，办税事项省内通办将在湖北省全面推行

据了解，目前，湖北省151个县区国地税局中，已有47个实行了国地税“互设窗口”办税，今年4月底前将全面实现国地税互设窗口。6月底前，共建办税服务厅和共驻政务服务中心试点工作也将全面完成。

湖北省国税局总会计师郑克俭表示：“推行办税事项省内通办，是湖北省深化征管体制改革的‘当头炮’，目的就是有效解决纳税人办税多头跑，到办税服务厅排号等候的‘堵点’和‘痛点’问题，让纳税人随时随地、轻松便捷办税”。此前，国地

税两家已对所有涉税事项进行全面清理，并对省内通办开展需求分析，目前正在武汉、宜昌两地进行前期试点。

湖南电商扶贫 让“农产品进城”

赖锦宏 台湾《联合报》2016年4月28日

湖南省商务厅和湖南省扶贫办日前联合发文，推出“关于引导和促进电商扶贫的实施意见”。将以51个贫困县为重点区域，8000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为重点对象，围绕“农产品进城”，打造贫困县农特产品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通过“互联网+”电商模式，让各类经营和服务主体充分参与到种养、收购、包装、存储、运输、销售等产业链各环节。

意见提出，到2020年底基本达到三大目的：一是所有贫困县基本普及电子商务应用，并建立县域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体系；二是所有贫困村设立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提供服务农户的网络代购、本地农产品销售、生活服务等电商扶贫服务，并整合政务、电信、邮政、金融和农技服务等；三是贫困户能通过电子商务销售自产特色农产品、购买生产生活资料。

同时，建立电商服务体系，完善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和配套设施，健全上下游服务链；依托国家、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和各地电商产业园、创业孵化园，为贫困地区网商提供创业孵化服务。建立特色农产品供应监管体系，确定当地特色农产品按照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商品化销售的要求，加工适宜网络销售的优质产品。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产业化经营，带动贫困户从事网货生产加工，建立完善的供应体系。

此外，还要支持各贫困县依托第三方综合电商平台，开设地方特色馆，支持通过电商平台的众筹模式进行“精准扶贫”，支持电商企业通过线上线下设立电商扶贫O2O专区，通过拓展农特产品网上销售通路，推动贫困地区农特产品外销。

意见还特别提到，要支持贫困地区物流快递发展。多形式、多管道、多类型发展贫困县、贫困村物流快递服务业。通过物流补贴、税费减免等方式，鼓励和扶持物流企业在贫困乡镇建立符合电商发展需要的物流配送门店，在贫困村建立快递服务点，开展集中收购、集中配送。

生态三峡岸电工程 创绿富双赢

王威钧 台湾《民众日报》2016年4月16日

三峡库区湖北秭归县沙湾待闸锚地，数十艘大型货轮靠港停泊。锚地静谧，也闻不到柴油味。“船舶接入岸电后，污染物的排放量减少九成以上。”中国国家电网公司秭归县供电公司总经理徐满清告诉中新社记者，靠泊船只接入岸电后，便可停用船上的柴油发电机，改用陆地电源供电，能有效控制噪音和大气污染，保护三峡库区生态环境。

“以电代油”岸电工程，是湖北三峡库区打造绿色航运的缩影。既要加快发展，又要保护生态安全，湖北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中兼得双赢。

湖北是三峡工程库坝区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在湖北省政府划定的三峡库区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内，有三峡和葛洲坝两大水利枢纽工程。多年来，该区域持续开展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数据显示，三峡库区地质灾害和经济损失同比均大幅下降。至2015年，湖北三峡库区连续13年实现因灾“零死亡”。

以保护三峡库区水质为重点，湖北巴东、秭归、兴山等地开展洁城行动，实施清库工程，推行节能减排，确保水质安全。据湖北省环保厅发布《2015年湖北省环境质量状况》显示，2015年湖北主要河流总体水质保持稳定，其中长江干流、汉江干流、三峡库区干流及支流总体水质均为优。

持续保护和治理使三峡库区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也让生态文化和理念渗透进了库坝区的生产和生活中。

沿长江西陵峡顺江而下，出南津关，便抵达中华鲟核心保护区。正在施工中的至喜长江大桥计划于年内通车。为最大限度保护中华鲟等鱼类资源，该桥增加2亿元造价，采用“一跨式”过江，在水中不设桥墩，被称为“生态桥”。

事实上，长江珍稀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一直在持续开展。豚类、中华鲟保护区相继建立，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长江水产研究所攻克了中华鲟全人工繁殖难题，并联合渔业部门持续开展增殖放流工作；三峡苗圃研究中心、三峡植物园已成功引种、繁育数万株三峡珍稀植物。

作为限制开发区域，湖北三峡库区一直在探寻发展与保护结合点，发展“飞地经济”，保护长江岸线；建设绿色航道，推进“绿色水运”，实现绿色崛起。

“营改增”为经济注活力

《澳门日报》2016年4月8日

下月一日，中国将迎来税收制度一次重大改革——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今次改革牵涉面广，意义大，能让更多企业减轻税负，有利于企业度困转型，为经济注入新动力。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到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考察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准备工作情况。李克强表示，此次“营改增”全面实施，实行行业范围和抵扣范围“双扩”，涉及新增建筑、房地产、金融、生活服务四个行业约一千多万户纳税人，落实结构性减税，可以让企业受惠；亦涉及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等各方面利益调整，不仅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而且要充分估计可能遇到的困难。要把改革“红包”实实在在发到企业手中，以政府收入做“减法”换取企业效益做“加法”、市场活力做“乘法”。

他强调，“营改增”要保证企业税负只减不增，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假发票扰乱秩序，今年预计要减收人民币5000亿元税收，这些税要减到实实在在、诚信经营的企业中去。

“营改增”是我国税收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目的是要消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税收制度障碍，同时总体上减轻生产性服务业相关产业链的税负。此前曾在多地试点。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营改增”试点方案。从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改增”试点。

截至2014年2月，广东（不含深圳）共有23万多户纳税人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今年1月，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座谈会，决定“营改增”作为今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全面推开。

全面实施“营改增”的目的，简单而言就是为了减少重复征税。过去，增值税主要以第二产业为征收对象，营业税主要以第三产业为征收对象。税制的不统一助推了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也加剧了税收不公平的问题。尽快实施以“营改增”为主的税制改革，是为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转型、生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迫切要求。

过去四年多的“营改增”试点经验表明，大多数行业和企业都会受益，但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餐饮业的一些企业，或因营业税率低于增值税率，或因难以获得足

够多的进项抵扣，实际税负有可能上升。要保证特定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平稳完成营改增的衔接，不能只是空话。需在确保税收公平的前提下，拿出更多优惠政策，鼓励这些行业通过扩大投资、购买设备、吸纳就业等方式扩大进项抵扣范围，平稳完成“营改增”的衔接。

全面推开“营改增”，企业将大规模减税，这对于企业顶住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度过难关无疑是雪中送炭，而且还可把税制完善优化，促进产业和消费升级。李克强曾强调，减税相当于“放水养鱼”，只有大多数企业受惠，才能实现经济“爆发式”增长。让企业“活”起来，企业现金流量就会增加，企业职工就能明显受益。“营改增”这步棋行得好，实体经济就会更“活”。

“营改增”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给企业带来挑战。它将促使企业在经营、劳务、物资、设备、财务、税务等多方面的管理相应调整，因此前期的准备工作将颇具压力。

在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后，地方财政的缺口有可能增大，地方财政支出责任与事权不匹配的矛盾可能进一步凸显。在全面实施“营改增”时，理顺央地财税关系的相关改革步子要迈得更大、更快。

中国制造业须另创优势

石建勋 香港《大公报》2016年4月19日

近期有境外媒体报道，大批在内地建厂的美国公司准备从中国撤资，并将生产线回迁至美国。主要原因包括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美国能源成本降低、中国物流成本过高等。该报道援引波士顿咨询公司估计，目前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仅比在中国高5%。至2018年，这一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至3%。

欧美国家重振制造业

如何看待外媒的报道呢？笔者无法核实其中的真实性，仅从文中提及的某些美企计划回迁来看，背后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全球产业再分工的大背景。

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令西方发达国家深切感受到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切肤之痛，经济金融化、制造业空心化严重影响国家的经济基础与金融稳定，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战略，更加关注制造业转型升级，将重振制造业作为经济复苏主要政策着力点，并相继推出一系列推动制造业发展的举措，试图做实实体经济，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

在此背景下，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推出一些颇具吸引力的优惠政策，鼓励投资制造业，推动高端制造业回流，并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的投入，采取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大政策举措。

与此同时，德国结合本国国情，提出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工业4.0”战略。这一概念已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未来发展方向的理论。

中国仍具备成本优势

对于上述趋势而言，首先，我们应该客观认识到，一些欧美国家为吸引制造业回迁本土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同时在比较成本差异不大的情况下，一些欧美公司产业链中的制造环节回迁本土，这是新一轮国家间竞争力培育，制造业版图重构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没必要大惊小怪。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环境保护力度加大、老百姓福利的持续增加，中国制造业成本的确有所上升，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中国不可能永远靠廉价劳动力、以牺牲劳动者的福利、健康和破坏环境为代价来维持低成本的制造业优势。中国制造的优势仍然存在。尽管薪酬水平快速上升，但中国的制造业薪酬依然远低于美国及其他国家，相关福利水平也较低。而且，中国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正在从非熟练劳动力向熟练劳动力转变，劳动力素质日益提高。中国制造业正处在比较优势转折期，即面临难得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目前外有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的挑战，内有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外资制造企业把生产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压力，亦面临高端制造业引不进来，低端制造业留不下来的尴尬境地。

与此同时，随着信息通信、生物电子、纳米等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的迅速发展和推广应用，人工智能、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3D打印等现代制造技术不断涌现，全球出现以信息网络、智能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

全球制造业发展模式正经历巨大变革，如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产业革命，在世界经济转型调整中占据主动地位，对中国制造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如何抓住机遇有效应对挑战，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占据优势地位？中国制造必须创造新优势，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加速制造业转型升级，完成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以做到“两面迎敌”而不惧。

具体来看，需要在以下几点着力：

一、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完善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建立以创新中心为核心载体、以公共服务平台和工程数据中心为重要支撑的制造业创新网络，建立市场化的创新方向选择机制和鼓励创新的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机制。强力推进产、学、研的协同创新和融合发展。事实上，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产业、企业、教育、科研等自成体系、条块分割的格局，导致了资源分散、机制不顺、协同创新的合力不够、驱

动力不足。

二、深化互联网在制造领域的应用，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考察全球的“互联网+制造业”生态，当前存在两个版本：一是以制造业企业为主导，从制造端推进“互联网+制造业”融合，该方案需要雄厚的工业技术基础，典型代表如德国“工业4.0”。另一种则以互联网企业为主导，从互联网端推进“互联网+制造业”融合，该方案主张互联网企业和制造业企业发挥各自优势。与从制造端推进相比，从互联网端推进所需投资更小、成本更低、适用生产场景更多、操作更灵活，天然适合中小微企业和创业企业。

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技术短板和结构短板的两大劣势，但在移动互联网方面独具优势。结合现实情况，笔者认为，中国应选择从两端同时推进“互联网+制造业”战略。对于部分技术密集型、大型制造企业，从制造端推进“互联网+制造业”战略；对于大量劳动密集型、中小微企业，从互联网端推进“互联网+制造业”战略。

三、健全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提升人力资本优势。应坚持把人才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根本，建立健全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努力打造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制造业人才队伍。重视高端创新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加大高素质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的引进和培养，设立行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最大程度地释放他们的聪明才智，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尽快转化为中国制造业的新优势。

四、进一步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培育中国制造新优势。德国的经验证明，加大对传统产业的研发投入，通过技术改造完善新兴产业链条，是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路径。中国的传统产业规模较大，面临着严峻的产业转型升级任务，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大力推动应用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在传统产业的重点领域突破发展。比如在能源产业中，可将电动汽车的研发作为重点，以顺应未来能源消耗的方向；在纳米技术应用中，可把汽车、化学、建筑、纺织等领域纳入到其中，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在服务业发展上，着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实施生产与服务一体化项目，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及服务企业的国际化。

房地产也迫切需要供给侧改革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6年4月27日

从去年年初开始，中国房地产销售开始回暖，房价也从去年四季度开始止跌回升——先在深圳和上海，后蔓延至全国更多城市。为抑制楼市非理性过热，上海、深圳及部分房价上涨较快的城市近期陆续出台了调控措施，进一步限购、限贷。

楼市调控似曾相识，但能否药到病除呢？例如，北京在2011年2月实施“限购

令”、在2013年4月提高二手房首付比例至七成，但调控以来房价上涨了44%，远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涨幅20%。相比之下，重庆是一二线城市中唯一没有执行过限购的，但其房价过去五年只涨了12%。这一鲜明对比让人不得不追问房价上涨的动因何在。

在分析中国乃至全球的需求前景时，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基本判断显然至关重要。但是，目前相关数据却非常零散，市场观点也极为分化。首先，中国实际城市化的过程究竟走到了哪里？采用国际可比的定义，中国实际城市化率可能只有40%左右，低于官方报告的56%，因为约有40%的“城镇人口”常住在更像是大村庄而非现代化都市的镇区。其次，中国仍缺乏大型城市。虽然中国目前已有几个人口超过2,000万的特大城市，但只有23%的人生活在总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而在美国和日本这一比例分别达到45%和65%。而且，中国房地产市场上居民杠杆率仍然非常低。中国居民仍处于“净债权”状态——居民总负债为GDP的40%，储蓄存款相当于GDP的82%。

平均而言，首付占到房屋价值三成左右，房贷约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0%。

中国的住房需求主要来自于改善性需求及城市化需求。过去十年内中国居民的住房自有率一直居于世界前列。几十年来农村居民的住房自有率一直在95%以上；而从90年代末房改以来，城镇居民的住房自有率也超过了70%。然而，大量家庭仍然住在尚未满足基本品质要求的住房里，例如24%的家庭住房内没有单独的厨房或厕所。此外，尽管过去10年内中国建造了大量的住宅，但城镇居民的住房自有率却从2000年的72%下降至2010年的70%，表明城市人口流入的速度超过了城市住房供给增加的速度。

良好的供给政策限制房价过快上涨

回到重庆的例子，近几年，重庆GDP维持着10~11%的高增长，在全国所有省市中均处于前列。2005年重庆人均GDP只有上海的20%，到2015年，这一比例已达到50%。2015年上海常住人口首次出现下滑，而重庆人口却呈现回流态势。综合来看，需求并不是造成重庆房价区别于其他一二线城市的因素，而不同的供给政策才是。

重庆试点的地票是打开土地供应瓶颈的重要举措。所谓地票，是指把农村闲置、废弃的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经由土地管理部门验收后腾出、并以市场化方式公开交易的建设用地指标。截至2015年底，重庆累计交易地票17.3万亩，涉及金额345.7亿元。2009-2015年间，重庆每年地票成交面积占当年土地供应面积的平均比例为12%。相比之下，上海建成区占比仅16%，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7%。上海仍存在大量农地，土地供应还有很大空间。

同时，重庆构建了以公租房为核心的住房保障体系，保障房供地占比达到22%，远高于上海的14%。截至2015年底，重庆累计开工建设公租房69.2万套，4,475万平方米。预计到2020年，通过实施公租房和其他保障住房，重庆城镇住房保障覆盖率将达到23.5%，解决低收入家庭以及部分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需求。新加坡的经验也表明，设

计良好的公共住房政策可有效支撑内需持续增长、促进收入平等分配并限制房价过快上涨。

低效土地供应将影响社会和经济

如果中国的二元户籍制度在未来5~10年内被基本取消，那么从其它国家的经验来看，接近14亿中国人中的70%左右将生活在城市里，其中50%将可能生活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中，四分之一左右会生活在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中。因此，宏观层面来看中国的城市住房将面临供给不足的局面，而那些工作机会更为诱人、公共服务更为完善，从而人口吸引力更高的城市则更是如此。

导致房地产供给不足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城镇住宅建设用地供应量过少。过去十几年，各地政府为了吸引制造业企业投资，纷纷提供大量低价的工业用地来招商引资，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又三令五申保护18亿亩的耕地红线。结果是，中国只有0.89%的土地被用作城镇建设用地，仅0.3%可用作建设住宅，这一比例在美国分别为2.7%和1.4%，在日本分别为5%和3%。另外，我们对2015年中国8.7万亿元商品房销售额进行分解后发现，政府从房地产销售额中拿走了60~70%——开发商和购房者缴纳的税费为25%，而土地出让金则占37%。

低效或不足的土地供应将会在长期带来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影响——香港今天面临的诸多挑战就是很好的例证。高房价会导致经济竞争力恶化，同时阻碍了代际间的社会流动。当年日本和今天香港的房价得以长时间居高不下，政策层面过度保护农业（日本）或维护大型开发商的利益（香港）而导致土地供应不足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值得警醒的是，一旦房价开始回调，下跌的时间会更长，且往往伴随更为沉重的代价。中国实在应该引以为戒。

房地产行业也应全面推行供给侧改革

总之，过去几个月内中国楼市量价齐升的表现不支持许多看空中国房地产市场和经济增长的流行观点。但是，房价上涨苗头的显现会在社会和政策层面引发担忧情绪。对楼市基本情况的判断不同，政策的选择自然会大相径庭，因此对症下药、治本也治标至关重要，才能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事与愿违。

既然是供应侧的问题，那就需要供给侧的解决方案。笔者期待房地产行业也能推行全面的供给侧改革，包括在农村人口流入较多的城市里增加土地供应、降低土地价格；坚定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特别是那些涉及公共服务和农村土地产权的政策规定；加强分层住房市场体系建设，构建合理、健康的房地产市场。新加坡和重庆的经验也表明，设计良好的公共住房政策可以有效支撑内需持续增长、促进收入平等分配、限制房价过快上涨并维持政府预算平衡。

2016中国经济的亮点与难点

沈建光 澳门《新华澳报》2016年4月2日

2015年中国GDP降至6.9%，不及7%年初目标，且创1990年以来的新低。考虑2016年财政与货币政策更加宽松，审计署审计之后，前期拖延专案陆续开工，以及“十三五”开局之年专案陆续上马，笔者以为，2016经济企稳是有基础的。当然，美好愿景能否落地，还需直面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困境，稳增长与调结构目标之间的艰难平衡，新供给改革能否切实落地，以及如何拿捏改革节奏等挑战。

2016经济新亮点待发掘

著名的拉弗曲线显示，在适度范围内降低税率，不但会刺激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增加政府收入。这样看来，以减税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取代以投资刺激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失为当下既有助于稳增长，又利于调结构的良策。

从经济基本面来看，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投资回报率下降、人口红利减少、劳动力工资上涨与老龄化以及环境保护等因素的影响，经济潜在增长率有所下滑，2016年四季度中国GDP跌至6.8%，全年增速为6.9%，低于政府目标，而结合更为悲观的发电量、企业利润、货运量等资料，不少质疑甚至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或比官方资料更低。

面对经济下行态势，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行减税降费政策，并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对于中国经济的陈疾可谓对症下药。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虽为中国经济开出“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处方，但是政府对整个经济运行的干预始终尾大不掉。近几年不断依靠政府投资实现“稳增长”更加剧了对政府有形之手的依赖症。2015年，部分因为财政收入增速下滑，完成“营改增”改革并借此实现减税的既定计划被迫拖延。

笔者以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代表了稳增长的另外一种选择：降低企业个人的负担，充分调动企业和居民部门的活力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著名的拉弗曲线显示，在适度范围内降低税率，不但会刺激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增加政府收入。这样看来，以减税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取代以投资刺激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失为当下既有助于稳增长，又利于调结构的良策。

不久前结束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长楼继伟明确表示，2016年和今后一

段时间将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进一步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并坚决制止各种乱收费和“过头税”，给企业和市场主体留有更多可用资金。此外，我国目前的社保缴费占工资总额比重超过40%，在世界范围内属于较高水准，部分原因在于弥补社保体系建立之前的历史欠账。笔者以为如果能够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以弥补欠账，也可以降低企业负担，推动劳动者工资上涨，实现藏富于民。

中国房地产市场自2014年遇冷以来，房地产市场投资持续下滑。尽管决策层已经从降低首付与税费、公积金政策调整，以及取消限购等多个方面支持房地产市场，房地产销售回暖，但三四线城市的高库存使得房地产投资仍然拖累经济增长。同时，房地产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房地市场景气度偏低对国民经济的综合影响不可小觑。

例如，从消费方面，购房需求不仅会直接影响建筑及装潢材料、家俱、家电等房地产相关消费，也通过财富效应影响居民消费。而从投资来看，房地产投资约占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0%，且上下游关联产业众多，如涉及到机械设备制造业、金属产品制造业、建筑材料、化学工业等多个行业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房地产对地方政府，特别是三四线城市财政影响较大。如今三四线以及东北老工业城市普遍面临房地产市场高库存的窘境，土地出让收入锐减使得地方政府捉襟见肘，甚至借钱发工资的现象也屡屡出现。此外，房地产市场是影响金融体系的关键因素之一。其不仅直接影响金融部门对于房地产行业相关信贷的发放，也会因为房地产和土地作为抵押品价值随房价波动而影响金融稳定。

从上述角度而言，三四线城市能否去库存，关系到2016年经济能否企稳。而此次决策层提出鼓励农民在所工作的城市购房，给予适当支持，符合去库存与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双重要求。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国家发改委已经在制定实施1亿非城镇户籍人口在城市的落户方案。

当然，当前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亿，全国留守儿童超过6000万，城乡流动儿童超过3500万，鼓励农民购房与落户，必须考虑到向上述人群提供与城镇市民相等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落实并非易事。这其中的资金缺口还需通过更多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才能实现。

另外，注重供给端改革是本届政府经济执政理念中的亮点，经济增长从本质来讲取决于资源条件与制度条件，即充分发挥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的力量，并通过鼓励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就明确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地位，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此框架下，经济工作会议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利于释放新需求；强调制造业升级，也是出于供需不匹

配，高端需求充裕而得不到满足，低端制造业存在普遍产能过剩的考虑；另外，放开二胎、加大教育投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等也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释放其对增长的作用；更深层而言，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企改革、财税改革则是从体制供给的角度，为增长提供新的支援。

笔者注意到部分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加速推进。例如中石油近期宣布整合其旗下的管道资产，为其管网业务拆分和独立做好准备。这符合国有垄断行业改革的基本思路，即天然垄断部门如油气管网成立独立公司并由政府直接监管定价，逐步开放可竞争部门如开采和炼化。

此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建立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这标志着自中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由政府以行政审批的方式决定新股上市的标的和节奏的运营模式将逐步让位于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模式。中国股权融资管道不畅，二级市场重题材炒作却不重视价值投资等诸多顽疾有望得到根治。

毫无疑问，2015年金融风险有所加大，体现在：一是资本市场经历大幅动荡，年中股灾造成40万亿元财富蒸发，并由于救市不力影响政府公信力；二是“8·11”汇改后，全球外汇市场动荡加剧，人民币短期内对美元显著贬值，为防止资金大规模撤离，央行出手干预，付出沉重代价，外汇储备一年之内从3.8万亿美元降至3.4万亿美元；三是信用违约事件层出不穷。例如由于大宗商品价格走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云南昆明泛亚所出现兑付危机，涉及金额400亿元；四是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背后监管缺失的问题逐步显现。P2P行业杂草丛生，近期e租宝事件显示互联网金融或是下一个金融风险集中爆发的领域。

为防止金融风险，决策层有必要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对现有金融框架进行调整。对此，当前市场已经有所讨论，但未形成广泛共识。在笔者看来，可以效仿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央行改革的最新经验，或采取超级央行模式，统一金融监管体系。

四大经济难点待解

去产能与去杠杆不可避免地会对经济造成冲击，而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又是试图避免冲击过大，支援增长不至于失速的举措。但根据以往经验，理想情况在落实过程中必将面临不少难点与困境。

当然，机遇与挑战同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诸多措施能否切实落实，还需面对如下挑战：

第一，全球经济疲软与美联储货币政策不确定增加了防范金融风险的难度。

在笔者看来，2016年海外经济的不确定性空前加大，体现在：一是美联储危机之

后首次加息，但考虑到美国制造业表现不佳，非能源贸易逆差高于危机之前，经济复苏前景的不确定性影响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步伐，增加变数；二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通缩压力。作为全球经济晴雨表的BDI指数跌至478，创1985年1月该指数创建以来最低水准，既预示全球经济困境，也表明欧洲日本抗通缩的形势仍然相当严峻；三是新兴市场国家危机重重，货币大幅贬值，巴西、俄罗斯更是重灾区，陷入经济衰退。

从这个意义而言，2016年全球经济的整体困境并不比金融危机时乐观，金融市场动荡局面也未见得轻松。这不仅意味着在新兴市场需求疲软，美国需求复苏难以弥补缺口的局面下，2016年中国出口形势会比2015年更严峻，更意味着中国经济仍将面临外汇市场动荡与资本专案流出的双重压力。此外，考虑到国内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如何既压缩产能、去杠杆，又能在资本项目开放不断推进的条件下，防范资金流出与海外动荡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冲击，这或是2016年决策者面对的最大考验。

第二，如何协调诸多工在实施中可能存在的矛盾？

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的理想愿景。其中，去产能与去杠杆不可避免地会对经济造成冲击，而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又是试图避免冲击过大，支援增长不至于失速的举措。但根据以往经验，理想情况在落实过程中必将面临不少难点与困境。

以产能过剩为例，“去产能”位列五大任务之首。但毫无疑问，无论是去产能，还是去杠杆，都已困扰中国经济多年。在经济下滑阶段，切实落实必将对增长造成打击，而这种阵痛决策层是否准备好承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告中提到，考虑到失业安置问题，提倡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是一种平衡思维，但也面临理想状态推进的不确定性。试想市场条件下，僵尸企业财务状况若已达到破产境地，反而要求兼并重组，又如何操作？由谁出面？倘若任务又会落到国企肩上，是否有违于国企改革初衷？

第三，制度创新能否实质推进？

在笔者看来，供给端改革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其实与三中全会的核心思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脉相承。为何有此判断，原因在于追溯困扰当前中国经济领域的诸多难点与矛盾，归纳总结下来，无外乎以下三方面关系尚未理顺：一是中央与地方利益存在博弈。正如上文多次所谈，房地产去库存需要地方政府资金，但如今财税改革在理顺财权与事权方面进展缓慢，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如何加大支出？考虑到官员考核与激励机制转变，当前地方政府不作为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二是各利益部门之间存在博弈。例如，当前“一行三会”目标差异化不利于防范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改革；落实税制改革方面，财政部与税务总局常无法达成一致意

见；项目审批方面，发改委与财政部之间也同样存在财权、事权和审批权不统一的现象。因此，避免内部损耗导致改革空转，需要破除部门利益，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做出安排。

三是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博弈。例如，早前政府寄予厚望的PPP，之所以推进缓慢，与民营资本担忧政府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传统做法密切相关；而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通过行政体制改革营造出合适的土壤。同时，只有通过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规范的法治氛围，以及制定适宜的标准，市场主体才有足够的动力实施创新。

毫无疑问，制度改革从上述角度有所突破并非易事，需要更大的改革决心。

第四，推进改革的节奏如何拿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化国企、财税、金融、社保医疗改革。笔者以为拿捏改革节奏，平衡改革与其他政策目标的冲突亦颇具挑战性。

国企改革方面，会议提出推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有意效仿新加坡淡马锡模式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而新加坡模式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成功在于着眼财务投资，政府并不直接干预企业运营、人事制度；国有资本更是以财务回报为主要标准可进可退。在我国，既想要引入市场化力量提升效率，又要兼顾国企内部党管干部原则，完成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的政治要求，强化国企控制力，难度不小。

2016年财税改革的要点之一在于完善地方税体系。在营改增之后，作为地方税主要税种的营业税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为地方政府找到稳定的新税基迫在眉睫。房地产税是许多国家地方税的主要税种，也符合地方政府激励相容原理，本应是完善地方税的主力品种。但是，当前我国大多数城市房地产库存偏高，房产价格或影响金融稳定的局面下，房地产税改革何去何从，短期内恐怕难有定论。

金融改革方面全会要求建立融资功能完备的证券市场。打通股权融资管道无疑将助力中国金融去杠杆，也有利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IPO注册制改革目前已经箭在弦上。但是中国的投资者大多为个人投资者，炒差炒新积习已久，大量股票估值水准显著高于成熟市场类似股票。注册制改革之后新股大幅扩容将严重打击投资者信心，反而不利于提升直接融资水准。但是如果继续维持政府对于新股发行节奏的管控，又违背注册制初衷。改革节奏的拿捏更需要寻求多方面因素的平衡。

中国经济为何减速？经济学家分析三大原因

九天 法国 欧洲时报网 2016年4月8日

中国经济2015年的发展速度放缓至6.9%，为25年来最低，引发外媒对中国经济减速原因及其外溢效应的各种评论。法国《论坛报》引用法国经济学家的观点，分析了中国减速的几个主要原因。

SKEMA商学院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多米尼克·朱利提出了三大原因。首先，劳动成本提高，是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中国的劳动成本已经超过菲律宾及泰国，中国制造不再具有以往的竞争力。而且，中国人口老龄化也将进一步提高劳动成本。经合组织指出，到2020年，中国劳动人口总数将出现下降，“劳动力市场出现萎缩，企业主必须提高工资。”

第二，污染造成隐性成本，而且这种成本越来越大，已经影响到经济发展。根据经合组织的最新报告，中国当局每年治污费用高达1.4万亿美元；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去年7月出版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每年因污染而死亡的人数达到160万人。

第三，制造业生产活动放慢。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全年大多数时间都在50临界点之下，钢铁、制铝和水泥行业的产能过剩；工业生产也不尽如人意。去年12月的年增长幅度为5.9%，低于预期。

另外，中国的出口在2015年特别疲软，仅此一项就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字，2015年出口减少1.8%（2014年时为2.28%）。不过，由于进口也下降了7%，外贸顺差仍达到创纪录的5150亿欧元。

最后，经济增长模式向消费转型尚未实现。经济学家古拉尔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表示，从2010年起，中国政府就想把经济增长模式转为依靠内需拉动，补偿国际竞争力的下降，但是目前还未见效。家庭消费的比重始终在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下。

美国CNBC报道指出，当前全球各国纷纷为中国经济下滑可能造成的连锁反应担忧，而中国面临的更大挑战是中国自己的问题，即如何降低产能、应对大规模裁员、控制股市动荡、防止资金外流以及妥善处理债务危机等。

不过，美国《财富》杂志网站的文章指出，美国不必担心中国减速，因为相比欧洲和美国，中国的经济火力仍然很猛，有足够资源应对经济艰难转型所产生的任何紧迫问题；不过，中国必须实施急需的改革。最重要的转变是告别对基础设施项目的依赖，同时，有必要对不受监管的地下银行、金融机构和工具进行管理，金融体系的透明度也有必要改善，这样才能恢复投资者的信心。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经济学家的观点也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外溢效应被夸大，中国经济仍能保持较高增速。高盛全球投资研究团队的研究显示，即便按照中国国内消费需求增速再放缓2个百分点、人民

币汇率继续贬值的假设情境来推算，美国和欧洲经济所受影响最多也仅为0.2和0.3个百分点左右。

中国经济有韧性结构转型见曙光

香港《大公报》2016年4月16日

中国经济止跌回稳有迹可寻，今年首季经济增速表面上放慢至百分之六点七，为七年来最慢，但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头马车，即工业、投资及消费增长动能在上月同步转强，实际上已呈经济小阳春的势态，可见稳增长措施发挥出预期效果，证明当局有政策、有能力应对结构转型带来阵痛以及外部经济下行压力，中国经济可保持相当后劲，不虞出现硬着陆。

中国首季经济表现符合预期，增幅对比去年末季的百分之六点九，仅轻微下跌零点二个百分点而已，而且处于百分之六点五至百分之七增长目标区间之内。自一二年首季中国经济增速低于百分之八之后，四年来增速回落幅度只是略超一个百分点，考虑到中国经济面临结构调整、升级转型关键时刻，增速稍为放缓一点也十分正常。

中国经济已释出触底企稳的积极信号，三月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消费品零售增长同步提速。上月工业增加值增长百分之六点八，较首两月加快了一点四个百分点，制造业景气明显有改善，而商品房销售劲升之下，首季房地产开发投资显著提速五点二个百分点至百分之六点二，带动首季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百分之十点七，较去年全年加快零点七个百分点。至于三月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百分之十点五，亦较首季百分之十点三增幅，加快了零点二个百分点。

多项经济数据有意外惊喜，增强了市场对中国经济复苏信心，同时反映过去一年多以来稳增长政策举措见效，包括多次减息与降准、推出大型基础建设项目及调整房地产政策，而首季新增贷款达到破纪录四万六千亿元，同比增长超逾两成，更是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势头的重要支柱。从首季经济数据之中，可看出中国步向以消费与服务拉动经济增长模式又向前迈出一大步，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转型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等方面渐见成效。

首先，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达百分之七点六，比整体经济增幅为快，而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同比上升两个百分点至百分之五十六点九。

其次，工业向中高端迈进。首季高技术产业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百分之

九点二与百分之七点五，增速高于整体工业增加值，并形成新增长动能。

第三，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即使面对去库存、去产能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首季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稳增长，实际增幅有百分之六点五，远高于发达国水平。

今年中国经济开局良好，企稳态势日趋清晰，全年可审慎乐观。经济转型带来短期阵痛与波动在所难免，但不应动摇中长期对中国经济前景信心，而本港将可受惠内地经济逐步回暖，需把握时机积极推动创新科技，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才能打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闷局。

新增就业减 内地经济大隐忧

余木《香港经济日报》2016年4月22日

内地今年3月份数据普遍回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7%，处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定全年经济增长6.5%至7%的区间。经济回暖，李克强总理可以安枕无忧吗？

首季城镇新增就业 同比跌1.9%

答案显然是不能。除了全球经济依然疲弱，内地经济回暖的基础并不稳固外，城镇新增就业动力不足，甚至轻微下降，相信是中国经济一大隐忧，尽管当前各大城市的失业率还保持平稳。

身兼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接受中国政府网高端访谈时，曾以4个稳，即增速稳、就业稳、物价稳和农业稳，来形容今年首季度内地经济形势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不过，在“就业稳”方面，他似乎避重就轻，只强调失业率平稳，而回避了城镇新增就业下跌这个敏感问题。

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数据，今年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318万人，比去年同期的324万人减少6万人，下跌1.9%，而与2014年一季度的344万人比较，更下跌26万人或7.6%。

“双创”变三创 失业率保持稳定

的确，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尤其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每调升一个百分点所创造的职位，已从过往的100万个上调到130万个，甚至超过150万个，但由于经济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创造职位总数仍面对一定压力。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破七”，仅增长6.9%，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1,312万人，虽然远高于1,000万人的预期目标，却比2014年的1,322万减少10万人或下跌0.8%。

不过，就算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下跌，失业率却依然保持平稳，这也是宁吉喆关于

“就业稳”的最大依据。他透露：“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失业数据，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一季度是5.12%，比去年同期下降0.07个百分点，环比持平。”

对于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下降，失业率仍然保持稳定，甚至轻微下调，完全拜李克强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所赐。因为这个“双创”，可以发展为“三创”——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毕业生+去产能 考验保就业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对“双创”变为“三创”便有深刻体会。他曾在一个记者会透露，去年内地新注册的市场主体大约在440万个，按一个企业雇用3个人算，就创造了1,200万个就业机会（部分企业或雇用少于3个人），几乎及得上去年城镇新增就业1,312万人。况且，今年保就业，内地继续面对重大挑战，除了700多万创纪录的高校毕业生投身社会外，中央提出的“去产能”问题，就会产生严重的就业问题，因为“去产能”当中，必然涉及到部分企业的人员安置问题，有可能衍生失业大军，倘若处理不好，有可能形成社会问题，并影响社会稳定。

从今年首季失业率，稳定在5.12%的水平，可以说是“就业稳”，但由于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下降，从这个角度看，则就业存在“不稳定”因素，这是刚企稳的中国经济一大隐忧呢！

科教文卫

中国确定今年深化医改六大重点

香港《文汇报》2016年4月7日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2016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让医改红利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会议指出，新一轮医改取得积极成效，人民的健康水平和人均预期寿命进一步提高。会议确定了2016年深化医改重点：

一是将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由100个扩大到200个。开展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示范。

二是在内地70%左右的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开展公立医院在职或退休主治以上医师到基层医疗机构执业或开设工作室试点。年底前使城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扩大到15%以上。力争全部三级医院、80%以上二级医院开展临床路径管理工作。

三是健全补偿机制，新增试点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严控不合理检查检验费用。年内实现大病保险全覆盖，让更多大病患者减轻负担。四是全面推进公立医院

药品集中采购，建立药品出厂价格信息可追溯机制，推行从生产到流通和从流通到医疗机构各开一次发票的“两票制”，使中间环节加价透明化。患者可自主选择在医院或零售药店购药。建立常态短缺药品储备制度，增加爱滋病等特殊药物免费供给，加强医疗和药品质量监管。

五是完善基层医疗机构绩效工资制度，鼓励试点城市制订公立医院绩效工资总量核定办法，建立与岗位职责和业绩相联系的分配激励机制，凸显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

六是推进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结算。提高基本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补助标准。新增规范化培训住院医师70,000名，其中儿科医师5,000名。统筹推进各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和互联互通。

会议还部署推进“互联网+流通”行动，以促进降成本扩内需增就业。会议指出，实施“互联网+流通”行动，是推动流通革命，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新经济的重要举措，有利于降本增效，拉动消费和就业。

李：深化教育改革激发活力

郭金超 澳门《华侨报》2016年4月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十五日在北京召开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五十三所在北京的部属、市属、民办高校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主要负责人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师代表就教育改革、创新人才培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等发了言。李克强说，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关系民族的未来，高水平教育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世界经济强国，无一不是教育强国。中华文明几千年生生不息，根本在于重视教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举办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重要力量。面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在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担负更大责任、发挥支撑作用。

李克强说，创新是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实际上是创新的竞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把蕴藏在亿万民众中的创造力发挥出来。高等教育要着力围

绕服务国家创新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育更多创新型人才。注重培养学生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意识，开展启发式、讨论式、探究式教学，激发他们丰富的想象力，打牢知识根基，拓宽学术视野，推动科技创新。注重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培育工匠精神，践行知行合一，多为学生提供动手机会，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助力提升中国产品质量。注重推动教育公平，继续对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大学实行倾斜，让更多困难家庭孩子能够受到良好教育，在平等竞争中拥有上升通道、释放创造潜能。

李克强指出，要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国家确定了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大举措，鼓励公办民办各类学校办出特色、分类发展。当前要抓紧出台促进一流学科建设的具体措施，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精准支持。通过一流学科率先突破，示范和带动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促进壮大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推动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

李克强说，要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结合高校特点，简除烦苛，给学校更大办学自主权。凡高校能够依法自主管理的，相关行政审批权该下放的下放，要抓紧修改或废止不合时宜的行政法规和政策文件，破除制约学校发展的不合理束缚。同时，有关部门要完善督导监管，积极探索为学校、教师、学生服务的新途径、新方式。各级党委、政府要健全制度，完善政策，为教育发展创造更好环境。

李克强强调，建设高水平大学要充分调动广大教学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健全教师评价制度，对教学、科研人员包括兼任行政职务的专家教授，实行符合智力劳动特点和规律的政策，不能简单套用针对行政人员的规定和经费管理办法，充分体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要求，给教学和科研人员更多经费使用权，更多创新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权，更好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积极提携后进，为青年教师施展才华提供舞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形成青蓝相继、人才辈出的局面，推动教育强国建设。

两手强化网络知识产权保护

马静 香港《文汇报》2016年4月20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昨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中国去年查处侵权假冒案件5.1万件，案值7.4亿元（人民币，下同）。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在发布会上赞香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世界领先，但同样也面临着来自微信等自媒体知识产权保护的挑战。他表示，用加大宣传和加大执法两手措施强化网络知识产权保护。

网络文学作品成“重灾区”

阎晓宏表示，网络特别是网络文学作品是侵权盗版的“重灾区”。他举例说，北京市石景山人民法院日前公布受理的涉网络案件数量，“与2014年相比，受理网络著作权案件471件，数量增长了近1倍”。他又表示，目前中国依然处于知识产权纠纷的高发期，特别是网络著作权的纠纷和矛盾在一段时期内还会存在。

如何解决网络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阎晓宏认为，一方面要加大宣传，让使用者有守法的意识；另一方面要加大执法，除了版权局和网信办、公安部、工信部联合组织的专项行动要加大力度以外，各级版权执法部门都要落实执法责任。

谈及中国未来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申长雨表示，要进一步修改完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进一步完善快速维权机制，为权利人提供更加高效、便捷、低成本的维权渠道；进一步做好海外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帮助企业“走出去”，实现国际化发展。

六省市文交所共建跨区域专家智库

龚舒斌《香港商报》2016年4月19日

4月15日，从六省市文交所2016年联盟(合肥)大会了解到，今后包括安徽、天津、山东在内的六城市文化产权交易所，将统一打造“跨区域专家智库”。

抱团组“跨区域专家智库”

据了解，作为目前安徽省唯一一家具有文化产权交易牌照的安徽文化产权交易所，2011年10月，与山东、辽宁沈阳、天津、湖北和广西等六省(市)共同建立文化产权市场联盟，定期以会议形式进行交流研讨，抱团力促区域性文化产权交易发展。前来本次参会的广西代表告诉记者，“文化产权交易有时涉及专业技术性较强，存在一定难度和风险，因此我们六省市联盟也希望通过抱团，打造统一跨区域专家智库，规避交易纠纷，最大程度上挖掘此领域的升值潜力。”

5年交易文化产权5.92亿

安徽文交所总经理汪浩在采访中表示，从目前来看，六省市文交所网上竞价平台初具规模，源源不断的异地文化产权交易需求，客观上也需要各地文交所成立统一专家智库，这也有助于统一鉴定标准。

安徽省文化产权交易所是经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和合肥市政府批准于2010年4月28日由合肥市产权交易中心发起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作为安徽省唯一合法冠名的文化产权交易所，该所依托安徽公共资源交易集团平台，通过规范化的市场运作，至2016

年3月，累计实现各类文化产权交易项目进场挂牌445宗，实现交易额5.92亿元，累计登记各类著作权项目2600多宗。

交易品种涉及字画工艺美术品网上挂牌转让及专场拍卖，各类版权交易，各类广告、文化场馆经营权出让和租赁等。

三农问题 县域经济

大寨进入“网际网路+”时代

孙亮全 澳门《华侨报》2016年4月1日

日前，山西大寨村258户村民免费领到了价值千元的4G智能移动手机终端，免费的WIFI也覆盖了全村。同时，科普中国乡村e站大寨服务中心正式启动，大寨集团成立的大寨粮仓网也正式上线。

“这标志着大寨正式进入了‘网际网路+’时代。”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党总支书记郭凤莲说。

60年前，虎头山上，大寨人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出了一条依靠集体力量战胜恶劣自然条件的丰产之路。“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让这个太行山腹地的小山村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国农业典范”。

改革开放后，大寨开始实施村办企业，走上了市场经济的新路。如今，“大寨”已成为四十多种商品的品种，2015年，大寨村的生产总值突破12亿元。

科普中国乡村e站是中国科协科普信息化工程中“科普中国·实用技术助你成才”项目的线下推广平台，旨在为农民搭建实用技术学习、远程互动培训、即时信息查询、农村电商创业、专家线上服务等平台。

通过移动终端，村民足不出村便可购买到放心农资和生活用品，还可以实现村民与省城专家线上交流互动，学习实用技术，了解农业政策、农业科技信息、农产品市场价格信息和科学生活知识。

“通过大寨粮仓网，实现农业信息和市场需求顺利对接，解决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农产品滞销、卖难买贵等问题，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山西大寨粮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舸说。

房价要降？调控后的中国楼市现在啥情况

美国 侨报网 2016年4月14日

2015年下半年来，中国楼市突然进入高热期。最近，部分房价上涨迅猛的一二线城市相继出台调控措施，为楼市降温；但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依然居高不下。那么，在调控之后，中国楼市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呢？已赶超美国的中国房价是否要降了呢？恐怕购房者要失望了。

3月份以来，北京、上海、深圳、武汉、合肥、南京、廊坊都出台了房地产调控措施。受收紧房地产政策影响，此前上升势头强劲的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出现明显降温、退烧信号，购房者进入观望状态，楼价大幅下滑，有报价千万元（人民币，下同）的房源甚至一夜猛跌160万。

外界预测，楼市退烧信号出现，房价将迎来转折。不过，真实情况可能会让购房者失望。

数据显示，之前几个月疯狂的楼市使得中国一二线城市的库存量明显下降。中原地产最新的统计显示，一二线主要的15个城市合计住宅库存面积3月为8645万平米，相比2月份的9116万平米环比降低了5.2%；2016年一季度一二线城市库存降低比例已经高达11%。

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库存持续低位，杭州、宁波、合肥、南昌、福州、厦门等二线城市的库存量已出现连续4个月环比下跌。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大部分一二线城市库存去化周期均接近历史最低点。

去库存压力的减弱，让房价降价动力急剧下降，持房待涨心态在地产商中蔓延。

2015年销售额为306.3亿元、中国房企排名第26位的正荣集团董事总裁黄仙枝4月12日接受上海澎湃新闻新闻采访时表示，调控有利于市场回归理性。短期内，调控新政对于制约成交量，控制房价上涨已经显效。但是从资源稀缺角度以及产业集聚度、人口等因素而言，一二线城市依然比较安全，特别是一线城市，房价下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光远看经济”作者马光远分析称，一线城市疯涨的房价其实会毁掉房地产去库存的努力，高层乐意看到一个稳步回暖的市场，而不是一个疯涨的市场，因为疯涨引发的风险是高层绝不愿意看到的，打压疯涨行情，控制各种风险就会成为必然的选

项。文章称，调控政策的出台，主要是严控疯涨，严控风险，但高层推动楼市回暖的基调没有变。

在这种心理预期和政策预期下，一线城市房价下降，已近乎妄想。

与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坚挺相比，三四线城市则面临较大的库存压力。

北京《京华时报》4月15日文章称，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2月份，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9052亿元，同比增长3%。虽然投资增速回暖，但库存再度增加。截至2月末，中国商品房待售面积73931万平方米，比去年末增加2077万平方米。

同策咨询研究部监测数据显示，2月份三四线城市商品住宅累计存销比为32.07个月，虽同比下降14%，但依旧远超合理区间15个月，大部分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压力仍大。

中原集团研究中心总监刘渊认为，三四线城市一方面存在供应过剩，房屋和土地存量过高；另一方面受产业基础薄弱等影响，人口增长慢甚至负增长，导致楼市供大于求。

证券时报4月15日文章称，中国指数研究院分析指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仍将呈现三四线高库存城市千方百计去库存、一二线热点城市加码调控稳定市场的基调。

基于楼市的现状，未来房价走势或可预测。

中国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4月5日发布报告显示，2016年房地产价格将保持明显上涨态势，涨幅将超过去年，预计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住房价格短期内将呈现大幅上涨态势，热点二线城市住房价格短期内也将呈明显上涨趋势，且房价涨幅有扩大的可能；而去库存压力较大的三四线城市房产价格短期内下行压力仍然存在，但预计降幅将有所减小，部分三四线城市住房价格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中国食品安全面临的挑战

傅琳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6年4月28日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众所周知，特别是在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后，有关食品安全的报道层出不穷。从地沟油、假鸡蛋到受污染草莓，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让中国国内的消费者对他们所购买和食用的食品越发感到担忧。根据皮尤全球态度（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的一项调查显示，71%的中国人将食品安全视为2015年的重大问题之一。提升中国的食品安全对于全球消费者而言也同样重要，因为世界各地的超市货架上随处可见来自于中国的食品和原料。

同时，中国的GDP增速正从历史高点回落，中国经济向消费驱动型模式转型势在必

行。打消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顾虑、增强消费者信心，是解决中国经济增长困境、实现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一环，广义而言，也是影响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

修订的法规，刷新的挑战

中国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于2015年10月正式实施，该法加强了对中国食品企业的监管以及对供应链的监督。但是，正如其它问题领域一样，真正的挑战并不在于法规的设定，而在于如何实施。食品行业难于监管，食品安全监管者面临着许多潜在问题，例如：作物对土壤污染物的吸附、食品生产过程中的非法添加以及销售商售卖假货或过期食品等不良商业行为。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者必须对国内食品行业的混乱现状加以整顿。诚然，对供应超市和食品加工企业的难以计数的农场和约35000家食品加工企业实行监管，确实令政府头疼，也需要一定时间，但也并非不可完成的挑战。

事实上，政策制定者和消费者已经有所行动。中国国务院公开表明，食品安全是头等大事，如果食品生产者和地方政府不能实施健康安全标准，他们将被问责。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覆盖了食品供应链的多个环节，直面回应了令人痛心的婴儿配方奶粉丑闻，并提高了对婴儿配方奶粉行业的管理要求。而其中最重要的修订或许就是对违法者进行更为严厉的问责。

严格的监督监管和更为严厉的处罚措施对于增强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信心来说至关重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农业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部门之间，仍需进行更好的内部协调。由于每个部门各自有一套食品安全相关的法规，相关部门之间更好地协调合作对于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顺利运行而言必不可少。

监管要求的提高和对供应链进行更多检查将会提高生产成本，从监管的角度而言，为使国内食品行业更易于管理，应积极推动产业整合。其中部分附加成本最终将被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而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则表明，他们乐意花更多的钱购买更安全的食品。目前国内有机食品行业、社区支持农业以及城郊地区白领农场的增长已经证明了上述观点。

提升食品安全，降低信任赤字

提升食品安全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健康的范围。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大部分源于对监管机构的不信任，而对监管机构的不信任则源于对不良食品生产者的不信任。铺天盖地的谣言——如政府官员享有特供农场食品，农民保有自己食用的无公害作物、而消费者却只能购买施放农药的食品等，进一步加剧了公众不信任和不平等的感受。除了食品安全丑闻之外，这些谣言或传言也加重了中国社会的信任赤字，因此，改善现状势在必行。减少违反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使食品供应链更加透明、以及保证产品质量可追踪性，将在长时间内使消费者重拾对食品供应、以及对生产者

和监管者的信心。这对中国构建强健的消费驱动型经济来说至关重要，从长远来看，也将有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

综合治理

习大大大脚解围旧经济

李海潮 香港《信报财经新闻》2016年4月7日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Bridgewater创办人达里奥早前形容“中国正经历心脏移植手术”，惟最新公布的财新中国3月服务业PMI数据却显示“手术”呈现一定风险，事关服务业稳步取代制造业的同时，相关就业指标两年多来首次低于50盛衰分界线，显示制造业的裁员潮已波及服务业职位增长。中国经济能否化险为夷，或可从习大大提倡的“足球梦”找到端倪。

习大大就任主席之初，中国便定下足球雄图大计，计划在2015至2025年于体育范畴创造8500亿美元（约6.63万亿港元）的经济价值，2017年前在内地建立2万间足球学校，训练10万名足球队员，至2025年足球学校数目进一步翻倍至5万间，这并非纯粹面子工程，背后牵涉到整个体育产业转型升级、金融创新及刺激旅游零售等服务业增长这“三支箭”。

足球梦经济改革缩影

体育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最明显例子是中超近年疯狂天价购买球星，今年2月的转会窗开展短短10天，中超的花费已达22亿元（港元，下同），轻松超越全球顶级联赛英超在整个冬季转会窗的18.7亿元，车路士中场拉美利斯、科特迪瓦前锋谢云奴等大牌球星纷纷来华赚取人民币，据闻英格兰球星朗尼及泰利等顶级名将都有意到中超掘金。

星光熠熠的中超已令日本J League及美国职业联赛相形见绌。目前，中超每年平均转播收入达19.16亿元，已远高于J League的2.2亿元。虽然与英超的242亿元相距甚远，但在球星效应日强下，中超转播费有望水涨船高，带动球衣、纪念品等周边业务猪笼入水。

借体育攻金融成趋势

足球热亦令相关理财产品应运而生。中超球会苏宁旗下的苏宁金融上月就首创与球队入球数、比赛胜负结合的“足球加息理财”产品，每逢有比赛，只要苏宁每入一球，产品收益就增加0.1%，最高加至0.5%，如果赢波再加0.2%。此类产品以类似众筹

的模式运作，原理是利用球迷资金壮大球队，赢波愈多产品就愈受欢迎，筹集到的资金就愈多。

此外，恒大淘宝早前在新三板上市集资，扬言推出足球互联网金融产品。阿里、乐视等互联网企业也纷纷成立体育公司，誓言打造集电子商务、媒体、营销、视频、家庭娱乐、智能设备、云计算大数据于一身的金融平台，“借体育攻金融”的趋势，为经济创新提供崭新动力。

催谷足球产业最终目标当然是争取主办世界杯，事关此举可带动基建、旅游及零售各行各业趋旺，正如2008年北京主办夏季奥运会获利20亿美元，2014年巴西主办世界杯进账134亿美元一样，习大大明言，希望中国在15年内获得世界杯主办权这只会“生金蛋的鸡”，但先决条件是提升世界排名只有83位的国家队水平。

球迷长年恨铁不成钢

目前中国主要透过两招让国家队“升呢”，除了上述强化中超大行动，还透过并购欧洲劲旅取经，首富王健林及“中国梅铎”黎瑞刚已分别斥巨资入股西甲劲旅马德里体育会及英超曼城的母公司，正是希望以他山之石攻玉，王健林旗下球会大连万达早前便派遣180名内地球员赴西班牙受训，期望炼成未来国家足球栋梁。

然而，这三支箭有机亦有危，若能顺利执行，固然可带动服务业职位迅速增长，但能否吸收在国家淘汰产能过剩行业过程中数以百万计的下岗工人，却是一大疑问，若没有政府巨额的再培训资助，失业的矿工根本不可能化身成与足球行业相关的技术劳工。至于足球金融产品创新更是满布地雷，原因是在监管存漏洞下，投资者随时买下不良产品而血本无归，投资规模达340亿元人民币的上海中晋资产管理昨天疑似爆煲，正好敲响了警号。提升国家队水平方面，其实与国企改革一样讲了很多年，但在既得利益阶层阻挠和贪腐问题拖后腿下推进极度缓慢，大洒金钱改革却事倍功半，导致球迷（投资者）长年恨铁不成钢。

由此可见，足球可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缩影，当中同样涉及转型、反腐及打假等棘手问题。有朝一日，中国轻松杀入世界杯决赛周、实力能与欧美列强比肩之时，或许也代表中国经济“心脏移植手术”成功。

中国网络治理“再定调”

韩咏红 新加坡《联合早报》中文网 2016年4月22日

中国最高领导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本周二（19日）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对广大网民，“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

于“出于善意的批评”，不论是“和风细雨”或“忠言逆耳”，都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他还说，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让互联网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

中国舆论空间近几年来持续趋紧，每隔一阵就发生凸出争议事件，牵连一些目标对象被批评或惩处。这类例子如2013年有宪政之争，2014年高校老师被批“毗必中国”，2015年央视主持人毕福剑被下课、律师浦志强因微博评论被控煽动民族仇恨、寻衅滋事等。同时，早几年受到官方肯定的“网络问政”也很少提了。

到了今年，官方与网络意见领袖拔河这根弦绷得更紧。2月下旬，官媒围剿任志强，一批名嘴帐号与580余个公众账号被封，3月“两会”期间，关于“两会”新闻的跟帖在微博上大范围被禁。时隔一个月，最高领导人提出对网民批评要有包容和耐心，让人有些意外，可以解读为中国的网络管理将回归“中道”。

迹象显示，周二的座谈会确有定调、布局与誓师的味道，这首先体现于会议规格之高，除了习近平、李克强，数名中共政治局委员、央行行长周小川，还邀请了马云等商业领袖与网络技术权威与会；其次，座谈会结束后，中央与地方的官媒随后跟进，《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这三大中央官媒都发表各有侧重的分析，新华时评提出“让互联网成为民主互动的新渠道”；人民网IT频道称座谈会“具有里程碑意义”，湖南日报旗下的华声在线发表评论指“学网、上网、用网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

从《光明日报》后续的报道可见，19日的座谈会内容甚广，涉及到互联网经济、互联网技术、网上舆论、网络安全等多个方面。

除了要求对网民多一些“包容与耐心”，习近平在会上也强调“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要本着对社会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这段表述与前述的“包容与耐心”相对应，换言之，在“包容与耐心”的同时也要“依法加强网络安全治理”，因此这在另一方面巩固了部分自由派人士认为高层将进一步加强网络言论治理的想法。

何况，座谈会在肯定互联网监督，要求党政干部欢迎与吸取批评时，是加了“出于善意的批评”这个前缀。

何谓“出于善意的批评”，善意与非善意如何评定，其中有一定模糊性，裁量权在官方手中，法律上什么样的言论算涉嫌威胁国家安全，也有争议空间。这是质疑者保持怀疑的依据，但网络批评不得威胁国家安全与执政安全，也是官方坚持的底线与清楚划出的“红线”。

总体而言，应该肯定中国领导人此番针对网上舆论的最新定调，基调与此前相比是偏向放松，这或许也正因为前几年、尤其今年2月的舆论氛围有些紧张，凡事走向极端就得回头，这是自然现象。

本周二座谈会结束后，香港环球经济电讯社首席经济学家江濡山在其个人博客中清楚地总结了该会的两大共识：一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不能因噎废食，必须加快发展步伐，拓展发展空间；二是要考虑中国特色国情，改善对互联网的管控，互联网安全和执政安全，是两条底线，只要不触及这两条底线，就应当善待各方面参与者。

倘若真是落实这个定调，中国的网络舆论将享有不小空间，也许确实有望发展成为发扬人民民主与人民监督的新渠道。

高层如确有决心，可考虑进一步以具体措施保护正常的网络舆论与网络监督，使发言者免于被动辄冠上“恶意”之名的担忧，甚至立法保护网络舆论与网络监督，否则，网络成为发挥民主监督新渠道的美好愿望，最终的结果也可能只是说说而已。



全球经济未来10年发展趋势

黎麟祥 香港《信报财经新闻》2016年4月5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3月初发出警告，中国内地外贸数据录得7年来最大跌幅，显示全球面临经济复苏“脱轨”危机；加上金融市场波动，大宗商品价格处于低位，环球经济信心脆弱，令经济与金融风险进一步上升。

笔者在本栏发表《市场动荡中的中国因素》一文，对今年全球经济形势作了一个扼要分析，并聚焦中国经济的不明朗和政策不透明造成的混乱。本文拟对环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未来中长期发展形势，作进一步深入说明，作为上文的“跟进分析”。

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近期股市的震荡和全球经济的脆弱性，是2008年大衰退的延续，中国经济目前放缓，是因大衰退的发生而搁置结构性改革的后果。事实上，中国经济在2008年已经迫切需要结构性改革，然而其迫切性被这个80年一遇的大衰退掩盖了。

因此，在2008和2009年，中国制定了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方案，来拯救本国和全球经济。现在，中国已经到了结构转型不能再延宕的地步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含义是，它需要变得更加可持续，这意味着用大量的投资去拉动高增长的政策必须减

弱，而这样会使增长率下降，经济放缓。

同时，一些过去一度繁盛的产业可能会萎缩，但经济放缓和个别行业的萎缩，将导致一些人对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产生疑虑和悲观情绪。因此，人们担心中国经济的未来及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一些需要回答的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经济的表现今后将如何？中国、美国和全球经济的中期和长期表现将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是重要的，因为人们需要了解当前的全球经济难题的原因所在，来规划长期的经济和投资策略。

中国转型料可兑现

中国的结构转型意味什么？笔者认为，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从投资驱动的增长过渡到消费驱动的增长。

2. 在各行业引入更多的竞争和更多的市场元素，并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此举将提高经济效率，以及可以减少腐败。这对上游产业尤其重要，如电讯、自然资源、交通、重工业和金融，因这些行业几乎完全由国有企业垄断。

3. 转型为以服务业和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减少农业的比重，这意味着有更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从而增加城市化。这将导致需要建设更多的住房、基础设施，以及各种设施，以满足新的城镇居民的需要。这可能说明为什么总理李克强在2016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说，城市化的加速将是国内需求的最大来源。

4. 把经济升级，通过把更多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变为创新密集和少污染的行业。后者要求对环保政策严格执法，前者要求改革教育系统，让学生有足够的灵活智力空间，以促进创造力更大发展，提供予企业做研发的激励措施，并建立机制鼓励高校开展基础研究。

5. 强调增长的质量，而不光是数量。更高质量的增长意味发展具可持续性、减少污染、分配更均匀、减少交通挤塞、减少区域发展不均衡、减少收入不平等、有更高的产品和食品安全、更好环境质量、更好的医疗保健、更好的教育和更好的工作条件。

笔者预测，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在未来10年将能够实现上述结构转型。在这个实现的基础上，我们可预期在未来10年：A. 中国的增长速度将放缓至每年约6%至6.5%，但仍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B. 人民币对美元和其他发达国家货币持续升值，原因是出口产品劳动生产率和全民工资相对发达国家持续增长，导致这些指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 C. 人民币将在国际上的贸易和投资中更广泛的应用，这将促进中国国际贸易和投资，从而使中国与世界在经济上有更紧密的联系。

在未来10年，全球经济大体上还未能摆脱大衰退的阴影。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衰退创造了一个全球经济的“新常态”。

目前看来，美国是第一个从大衰退中真正复苏的发达国家，由此可见其经济体系的灵活性。现今美国是世界经济中的唯一显著的亮点，并可能在未来几年持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火车头。事实上，美国现在处于近一个世纪以来为期最长的经济增长。尽管IMF预测在2016年印度的增长速度为7.5%（与中国的6.3%相比），但印度经济规模比中国小得多，以致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远不如中国那么大。

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充满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下行之势未遏，新兴市场经济体亦告失色，国基会已把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目前美国的表现可谓“一枝独秀”，2015年美国全年GDP增长2.4%。IMF估计，2016年美国增长率为2.6%，比2015年更高。

今年2月份，美国非农就业职位大增24.2万个，失业率维持在8年来最低的4.9%水准，劳动力市场处于“全民就业”状态。然而，由于美国社会贫富悬殊情况也很严重，不均匀的现象亦在劳动力市场有所体现，穷人失业率仍高，而教育水准较高的劳动人口就业情况则较理想。

美复苏成全球亮点

据联储局最新议息会议公布的息率预测显示，今年底息率预测中位数，由去年12月的1.375%降至0.875%，意味今年联储局加息的次数有机会仅两次。事实上，目前美国通胀率低，过去4年，一直低于2%的目标，故联储局没有透过加息去遏抑通胀的迫切需要，因此，利率处于低水准，对企业借贷投资很有利。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经济的规模大，而且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故中国经济下行，对美国的影响和冲击不会太大。换言之，中国经济下行并不足以左右美国经济进一步好转的基调，因此，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唯一亮点，可以说是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领头羊”。

从数据看，美股自2009年至2015年中的飙升，道指由2009年1月初的8700点水准，升至2015年中的18000点水准，这种牛市在历史上不常见。然而，笔者估计，美国股市和全球股市今后不会像在过去6、7年那么看涨。在接下来的10年中，美国和全球股市很可能是一个平稳而缓慢上升的趋势。美国股市由“绚烂归于平淡”，估计未来10年的基本走势，“平稳”成为新常态。

笔者估计，美国经济在未来10年的增长速度，将是每年约2%至2.5%的水准。这是比金融危机前的平均水准低了一点，但增长的质量会更好或更能持续，因为它不是杠杆化（leveraged）的增长，也就是说，企业和个人不是靠大量借贷来维持盈利或消费增长。

未来10年，估计利率还会很低，因为联储局和发达国家的央行会很缓慢和谨慎地调整政策利率。另一方面，在所有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欧罗区和日本，通货膨胀

率都持续低企。原因是当公众的通胀预期是低的话，它就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sy），央行也毋须用加息来遏抑通胀，因此息率也低。一般来说，低通胀低息率的全球经济格局表明经济并不炽热，原因除了中国因素以外，就是以下我要说的因素。

有一个与大衰退无关、却在未来几十年对全球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因素，就是人口因素。

人口老化利率长期低企

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年修订版（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Prospects Revision 2015），自从1950年以来的第一次，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将在2016年萎缩，到2050年将萎缩5%。到2050年，中国、日本和欧罗区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大幅下降。到2050年，各国劳动年龄人口收缩率将会是：韩国26%，日本28%，德国和意大利：23%，俄罗斯和中国：21%。在先进国家，美国是唯一的幸运儿：它的劳动年龄人口到2050年会增长10%。

日本可能是人口变化影响到经济的最极端例子。1996年，该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萎缩，并且在几年前，总人口也开始萎缩。据预计，日本经济增长未来10年将继续低迷，因为人口下降，同时，在上述国家中，年龄超过65岁的人口比率会很高。这种趋势将导致发达国家（除美国）和中国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储蓄率上升，利率下降，退休年龄上升。这是笔者预计今后10年利率低的另一个原因。

以一带一路重建香港人心

邵卢善 香港《亚洲周刊》2016年4月3日

2013年9、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中亚及东盟，先后提出“一带一路”的构想蓝图，经过两年多的争论、商议、铺垫，以至不久前由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开始营运，“一带一路”水到渠成，迈步向前。

“一带一路”的一带，是从中国西北铺建三条陆上通道连结欧洲，一路则是水陆南下经东盟、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入波斯湾至地中海。终极目标连结亚欧两洲，透过路经国家地区的双边或多边平台，促进文化、贸易交流，突破现有壁垒。

中国快速崛起，西方赞叹之余，也存几分疑忌，在评论“一带一路”这个构想的时候，难免戴上有色眼镜，诸多猜测。过去两年，这个构想逐步浮现落实为行动的细节，西方国家了解增多了、认同更多了，纷纷接受这将会是一个利好共赢方案，顺利推行的话，不仅牵头的中国获益，所有参与持份者俱有分红利得。

“一带一路”工程牵涉广泛，利中肯定有弊、安处必蕴危机，需要中外各方衷诚

合作，去芜存菁，化异求同，才能完成大业。香港特区拟订策略配合，俾使港人得以参与其中，一为神功，二为弟子，实属履行职份。可惜，行政长官梁振英施政报告提出之后，并未获得社会适度回应，对之冷嘲热讽的个别言行反而获得热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港人安于逸乐，满足现状，日渐拙于求新、怯于开拓。2000年初接踵而来的天灾人祸，驱使求变心切的香港社会被意识形态撕裂，凡事以立场为先，新政难有共识，寸步难行。

政制改革讨论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原是社会和合大好契机，最后临门一步破裂，政制原地踏步，社会裂痕创伤更甚。旧问题悬而未决，新纷争又不断升起，连大学校园也不再清静。香港如何还可以不翻一章新篇？

“一带一路”工程，是香港社会重拾开拓求新精神、缝合族群裂痕的最佳切入点。大家不妨透视方案细节，这个被称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方案投资基本建设，把东亚、东南亚、中亚、西亚，与欧洲连结一起，互联互通，对人类社会的功德超越“马歇尔计划”。香港拥有道路桥梁建设管理、金融服务、互联网络等专才，投入浩大的“一带一路”工程，大有用武之地。马歇尔援欧计划那个年代，数以万计美国年轻世代越洋前赴欧洲发展，既开创个人事业，又贡献人类和平，奠定其后半世纪美国领导世界的地位。香港年轻世代，何不就此取经？

“一带一路”不是横空出世，而是有特定的时空因素，触发中国牵头推动。正如一九四七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二年，美国因为内外情况考虑，推出“欧洲复兴计划”，内部方面，希望振兴欧洲经济以购买美国的商品与军火；外因则是抗衡苏联扩张、防堵共产势力吞蚀欧洲。七十年后的此时此刻，中国产能过剩，资金、技术需要出口，又面临美国围堵，借由投资“一带一路”区域的基建、促进贸易，既可解决本国经济结构转型之困，又可协助友国经济发展，一举多得。

如果说，欧洲迅速复兴以至后来经济一体化乃得助于“马歇尔计划”，那末，“一带一路”成功推行之造福人类社会将更超越马歇尔。

当年欧洲本是先进地区，毁于战火的只是基建与资金，人才与知识损失不大，只需美国资金援助；如今“一带一路”所涵盖地区多是发展中国家，既乏资金、也没有技术专才，需要外界助力巨大得多。

其次，当年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地区基本是基督文化背景，宗教文明相异不大；“一带一路”涵盖地区则各类信仰都有，既结合东方文明，又几乎串连了所有主要伊斯兰、基督教国家，文化传统迥异，一旦该等地区的落后国家有了基建、资金、技术，国力有所提升，地域内互联互通、互补长短，拉近贫富悬殊，减少隔膜误解，可杜绝恐怖主义托庇宗教作祟，根除亨廷顿所预见的文明冲突。

协助“一带一路”完成建设大同世界，特区政府拟定配套政策只是第一步，下一

步还须借着解说方案，推动人心工程，重建社会互信。解说细节方面，对象不仅仅是有能力投资的机构与个人，还需尽量全方位向学者、媒体详细解读，借助他们引导社会大众认识判断。重点不必在于如何协助国家完成复兴中华的“中国梦”，而是着力透明，公布一切相关法例、务实讲述来龙去脉、清楚分析利弊风险。

过程中，香港社会大众得以明了“一带一路”的精髓，也等于上了一课世界地理，对港人较为陌生的中亚、南亚、西亚文化，补添粗略认识；更重要的是，也借此上了一课最新国情。

“东亚奇迹”能否持续？

陈绍锋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6年4月19日

东亚的崛起具有几大标志性的事件。一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东亚的经济增长率执全球之牛耳，领跑全球其他区域。二是东亚经济的高成长性有明显的阶梯承接性。从早期的日本在走出战争废墟后迅速腾飞，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紧随日本之后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再到中国、越南。在每一历史时段，亚洲均出现了领头雁经济体，引领亚洲经济。三是除北美、欧洲两极外，亚洲地区已然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三极。该地区不仅拥有全球诸多产业和产品较为便利完整和深度整合的生产链，或者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一端，而且是全球贸易至关重要的供给侧要端，亦是“世界工厂”地位的题中应有之义。四是世界各大国出于其林林总总的战略利益考量，均更加注重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世人皆知奥巴马政府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实际上其他各大国同样制定和实施各自“转向亚洲”战略。尽管它们内涵和版本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更加重视亚洲战略地位及其作用。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从军事、经济等方面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中国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尽管延伸到其他大洲，但其重心仍在亚洲。日本多年来一直在亚洲布局、经营亚洲。考虑到亚洲地区巨大的市场潜力和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数量，欧洲大国如德国、法国和英国等非常积极主动地大力开拓亚洲市场，力图加强与亚洲国家的经贸联系，为陷入债务危机泥淖的欧洲经济注入强大动力。同样，为了规避欧洲国家减少对俄罗斯油气进口依赖的企图，莫斯科大力拓展亚洲市场，为实现本国油气资源出口的多元化而竭尽全力。

因此，东亚的崛起是一种客观事实而非言者臆断，但是，过去东亚的崛起存在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地区性大国，特别是中美两国能够和平共处，或者至少能够维持战略性合作（尽管两国在很多议题领域存在分歧和矛盾）；二是领头羊经济的高成长

性，即东亚地区存在某个引领该地区各经济体的领头羊经济。领头羊经济体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既是外资的吸金池，从而为组织地区生产和服务创造了条件，同时，它又为周边国家提供了商品和服务流向的最后市场（market of last resort）。但上述两个条件在当今情势下均面临挑战，从而很有可能阻断东亚的崛起进程。笔者曾在FT中文网撰文论述东亚安全方面的挑战（《东亚从“二元格局”走向“二元背离”？》），本文主要探讨后一因素。

领头雁经济

过往东亚的崛起，亦称“东亚奇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地区存在一个或一批领头雁经济。在学界，人们常借用“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来解释东亚经济发展。“雁行模式”存在的前提条件是日本持续在产业和技术创新方面保持领先地位，日本愿意转让技术，以及各国产业梯度差的存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条件都在发生变化。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已无法担任东亚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角色，中国逐渐成为拉动东亚区域经济增长的领头羊。

尽管日资、亚洲“四小龙”的投资的确对中国经济成长有很大贡献，但中国的经济成就并非“雁行模式”所能解释，因为中国并不是简单地靠承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淘汰产业和技术而发家，而是接收了包括美欧等来自五湖四海的海外投资。实际上，同迅速增长的双边贸易相比，（中日）经济技术合作领域的进展却难令人满意。日本在对华直接投资和高技术转让上始终犹豫不前，不仅大大落后于美欧，也同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水平极不相称。同时，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逐渐成为带动本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一角色主要由两个机制所促成：一是东亚地区存在的华商商业网络。这一网络对中国引进外资，促进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在中国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中，有60%以上的外资为华商（含港澳地区）投资，70%以上的外资企业为华商投资企业。华商网络的优势在于它是“穿越政治和非关税壁垒的天然孔道”。在公司层面，该网络有助于大大降低海外华人企业运营的交易成本，加强海外华人企业间资金、信息、业务上的联合；在区域层面，华商网络则是促进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经贸联系的粘合剂。目前，华商网络很大程度上已内嵌于下述区域生产网络。

第二个机制即为以中国为中心，嵌入于全球经济循环机制的区域生产网络。这一基于比较优势而织成的生产网络将东亚各经济体连接在一起，伴随中国经济的腾飞，东亚其他经济体亦从中获益匪浅。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展现了强劲增长的活力，越来越多的外商选择到中国投资设厂，这些外资充分利用东亚各经济体不同的比较优势，从中国周边进口所需的零部件、中间品、原材料和资源，进行加工制造，产品生产因此被细分为多个环节，并由多个国家协作完成。

不同于传统的基于技术垂直和层级转移的“雁行模式”，这种发展方式创造了一种“平行发展”模式。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产业间分工体系，形成了以产业链为基础的产品内分工体系，产品的“国籍”变得越来越模糊，国际贸易失衡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双边问题，而是一个网络状的多边问题。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中国对外经济活动的70%集中在东亚地区。东亚各国是中国贸易和投资的最大伙伴，投资中国的外商85%来自东亚，中国经济崛起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将更为巨大、直接而深远。事实也表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东亚多数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且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深入发展，中国在整个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成为推动东亚经济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区域生产网络的挑战

然而，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也开始面临一系列挑战：其一，这一生产网络的创立和维系高度依赖区域外的消费市场，特别是欧美市场，故经济发展受域外因素的影响较大，这一点即便在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后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中国经济的崛起大大加强了东亚国家和地区间的横向经济联系，亦使上述局面有所改观，内生经济变量正逐步成为东亚地区发展的主导力量。但问题是，中国经济本身也高度依赖以欧美市场为主的外部市场。欧美市场至今尚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靠量化宽松刺激下的经济反弹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仍有待观察，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即便欧美经济步入正常增长轨道，危机前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也已经走到尽头。其二，中国经济放缓影响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活力和张力，进而影响周边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下滑一方面导致需求不振，进出口双向锐减，对依赖东亚区域生产网络链条的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冲击；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下滑也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挫，对那些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新兴经济体而言，不仅意味着财政税收锐减，债务负担上升，而且影响本国就业，造成社会政治危机。展望未来，中国经济正在由投资、重工业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新的增长方式尽管不会马上对传统的主要服务于加工贸易的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产生挤压效应，但这一区域生产网络必然面临国家间产业布局、价值链分工和国际贸易格局的调整压力，进而影响东亚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增长。此外，预期美联储将继续收紧货币政策，进入加息周期，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将面临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的压力。其三，美国主导的“两洋战略”将极大地冲击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为了打造新时代的贸易与投资规则，美国正大力推行“两洋战略”，即在太平洋打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及在大西洋推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尽管这两个协定的最终签署尚面临阻力，但它们对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影响有以下方面。

(一) 对两大协定之外的中国及其他东亚地区经济体而言，由于贸易转移的效应，在产业链的低端，这些国家和地区将面临TPP的发展中国家如越南的贸易和外资竞争；而要打入美欧日主导的产业链高端，这些国家和地区将更加举步维艰。整体而言，TPP和TTIP将显著增加和刺激美欧的贸易和出口，而处于两大自贸区以外的国家贸易和出口相应会明显下降。相关机构的预测显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可能减少30%以上。

(二) TPP在日趋一体化的东亚经济整合中也打下了楔子。在过去20年，东亚的区域经济整合有两条路径。一条是东盟领导的，围绕东盟所开展的“10+1”合作而不断推进。在“10+1”基础上，东盟还推出了“10+3”、“10+6”乃至其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协定》(RCEP)。由于东盟成员国中只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和文莱四国加入了TPP，而其他成员国要么没有申请，要么门槛太高而难以加入，TPP一方面将对东盟造成撕裂，另一方面也将褫夺东盟在东亚区域整合中的中心领导地位。此外，无论是“10+3”还是RCEP，都将因日本与部分东盟国家选择加入TPP而受到影响，它们对“10+3”与RCEP的需求至少不是那么迫切，在相关谈判中反而可能漫天要价，增加谈判的阻力，导致亚洲区域合作难以前行。

另一条路径则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立之初即被寄予厚望，希望藉由这一组织推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但由于APEC成员国所做出的承诺缺乏约束力，多年之后，目标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依然非常大，APEC渐被视为清谈馆。但如果TPP付诸实施，一种可能性是导致APEC在区域合作的影响进一步下降；另一种可能性则是APEC重拾生机，在TPP的刺激下，亚太国家和地区转而以TPP为基础进行深度整合。何种可能性为大？关键取决于中美是选择战略合作还是选择战略对抗。

(三) 适应贸易和投资新规则将大大增加处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内企业的改革成本、调整成本和生产成本，也抬高了进入欧美市场的隐性贸易和投资壁垒。无论是TPP还是TTIP，目标均要打造所谓的高标准的“黄金准则”。这些规则范围之广，内容之深，远超以往任何的贸易协定。以各国已签署的TPP来看，不仅有传统贸易协定通常涵盖的关税减让、原产地原则、知识产权和贸易争端解决等内容，而且加入了卫生、环境和劳工标准、服务贸易、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竞争政策、自然人移动、竞争中立等新内容。即便是前者，如原产地规则等，其条款也更为严苛。

纵观其协议内容，TPP可谓充分反映了美国的利益关切及其竞争优势，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大资本的利益及弱化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竞争优势的企图。这些规则本身对非TPP成员国造成很大的歧视性和排外性，但要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唯有适应这些新规则。这也意味着对那些参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国家和地

区来说，必将承担巨大的调整成本，无论这种调整是基于主动的抑或被动的反应。

内忧外患

故此，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双层挑战中，其在东亚经济中所发挥的领头羊作用亦存变数。如果中国的领头羊地位消失，东亚经济的持续崛起需要寻找到新的接棒者。没有这样的领头羊经济，东亚经济的集体崛起很可能半途夭折。

那么，谁有可能成为新的接棒者？或者说，成为这一角色所需要的条件是什么？我们认为，其必要条件一为该国经济体量足够大且处于上升通道，二是该国经济需与东亚各经济体深度融合。放眼全球，大抵只有美国或者印度有这样的潜质。美国的优势在于：其体量足够大，能够为东亚国家和地区提供必要的技术、资本和商品吸纳市场。但阻碍美国的劣势在于：美国的产业重心在服务业，其所经营的制造业主要根植于基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区域生产网络，而非追求与东亚经济体的经济整合，这意味着美国难以与东亚经济进行深度的融合。另一个可能的接棒国是印度。其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态势，以及该国巨大的市场潜力的确有助于印度取代中国发挥领头雁的角色，但印度的劣势在于：该国是内向型经济体，其对外部贸易的依赖并不大；印度也是服务业立国，制造业相对落后，难以与东亚经济体的产业体系进行恰当对接。

综上，一方面，在安全上，东亚经济崛起所需的大国和平相处的大环境正遭遇中美战略互信赤字以及冲破底线的挑战；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放缓美国力推全球经贸新规则的背景下，东亚经济崛起所需的领头羊经济角色也趋于减弱。如果经济和安全方面的上述趋势没能得以逆转，安全上东亚可能陷入巴尔干化的困境，而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光环很可能褪去，导致多数经济体难以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学术前沿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届满续租的法律问题

2016年4月18日 法制网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杨立新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概就是说的温州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 20 年期间届满有偿续租做法所引起的全国的强烈反响。就目前的舆情看，支持温州市政府做法的舆论基本上没有，普遍的意见是持反对态度，因为这种做法违反《物权法》第 149 条规定。对此，我提出以下意见。

一、《物权法》第 149 条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届满自动续期的由来

2007年颁布实施的《物权法》第149条第1款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这一规定究竟是怎么来的，有一个过程。

最早的《物权法》草案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间是70年。这个草案公布公开征求意见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主要的疑问来自于广大业主。他们认为，工薪阶层辛辛苦苦一辈子，攒下一套住宅，对房子享有永久所有权，但是对于土地的使用权却只有70年，到期后，国家收回土地使用权，我们的房子放在哪里呢？将来怎么能够在土地上继续生活呢？当时，这种意见非常普遍，直接涉及人民群众对《物权法》的信任问题，也涉及对国家和政府的信任问题。立法机关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也深刻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进而统一认识，明确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自动续期。这样个规定，给老百姓吃了一颗定心丸，终于不再怀疑《物权法》了。可以说，《物权法》关于住宅建设使用权自动续期的规定，是得民心的，也是《物权法》获得高票通过的重要原因之一。这说明，立法、政策只有贴近民心，解决人民群众所急、所需，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欢迎。

事实上，在较早的时候，我国城市私有房屋的业主是享有土地所有权的。尽管那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城市居民都有私有房屋，因为大部分居民是租用公房，但凡是私有房产主都享有土地所有权，作为土地所有者，负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只是在1982年《宪法》实施的那一天，所有的城市土地私有者的土地所有权，都被无偿征收，其享有的土地所有权变成了土地使用权，中国城市居民不再享有土地所有权。

根据这样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中国城市居民在今天购买商品房屋设立私有房屋所有权，其土地的权利，尽管在土地公有的体制下不能是所有权，但是其享有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当能够基本上保证业主对行使房屋所有权的需要。正是由于业主对住宅的所有权是永久的，对于住宅所依附的土地权属尽管是使用权，应当与住宅的永久所有权相适应，因而才出现了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应当自动续期的规定。这样的规定是符合物权人行使物权的要求的。其实，当城市的住宅土地权属是所有权时，业主应当向政府缴纳税金；当土地公有，业主取得住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所缴纳的费用，应当与其原来缴纳的税金的数额基本相适应，而不能过于悬殊。现在的问题是，建设用地使用权由政府出让给开发商，是超高价格的，当将其转让给业主时，就将这样的超高的土地价格全部转嫁给业主了。如果70年期间到期之后再另收续期的出让金，并且保留政府收回土地的可能性，就使业主仍然是生活在忐忑之中，并无安全感和稳定感。这些问题，决策者必须认真思索。

总之，《物权法》第149条规定的自动续期，保障的是业主的权益和对物权的安全感，不能任意改变。因为它涉及到的是民心，是政府的威信和信誉。

二、温州的做法是否符合《物权法》第149条规定的原则

温州市的居民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存在 20 年、30 年以至于 70 年等不同情形，目前到期的是 20 年期间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据调查，在重庆，当时为了降低房价，让百姓能够买上房，推出 50 年期间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也不同于 70 年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间。

温州市在处理已届 20 年期间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同意自动续期，但是对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进行评估，再令业主补交较高数额的出让金。正是这样的做法，才引起了全国的轩然大波。

对此，我的看法是：

第一，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间届满，必须自动续期。对此，任何人、任何机关包括各级人民政府都不得违背这一规定，强制要求业主必须经过申请才能够给予续期。

第二，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最高期间是 70 年，约定 20 年以及没有达到 70 年期间的，首先应当自动续期至 70 年。

第三，对于没有达到 70 年最高期间续期至 70 年的，是否应当补交出让金，应当考虑到：一是 70 年的使用期间和 20 年等不足 70 年的期间不同，出让金的数额应当是不一样的；二是政府出让 20 年的土地使用权，续期如果不补交出让金，政府的利益会受到损失；三是如果 20 年等期间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业主在续期时不补交出让金，对其他已经缴纳了 70 年出让金的业主而言，是不公平的。因此，20 年的期间届满自动续期的，业主应当补交 20 年与 70 年土地使用权期间的出让金差价。

第四，对于具体出让金差价的计算，应当按照出让土地使用权当时的出让金价格计算，即当时 70 年期间的出让金价格是多少，20 年或者其他期间的出让金与其相比，差额是多少，就应当补交多少出让金。考虑到毕竟取得使用权的当时应当缴纳而没有缴纳其余年限的出让金，因此，在补交出让金时，应当计算 20 年的银行贷款利息，由业主负担。此外，不得再增加任何费用。凡是与此方法不同的算法，结果高于这个计算方法的计算结果的，都是不正当的。

应当注意的问题是，在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时候，确定 20 年的期间与 70 年的期间之间的价格，并非按照一年一年计算，因此，实际上 20 年的期间与 70 年的期间并非一年一年的计算，确定差额。应当按照当地当年出让 70 年土地使用权与 20 年使用权的差额计算，更为准确。超过当年出让 70 年土地使用权的出让金价格补交出让金的，也是不正确的，是侵害了业主的合法权益。

三、如果理解《物权法》第 149 条规定“自动续期”的条件

应当看到，《物权法》第 149 条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自动续期”，并没有规定任何条件。对此，究竟应当怎样理解，有不同认识：一是认为既然

没有规定自动续期的条件，应当理解为无条件。这样的道理应当说得通。二是立法当时因为时间紧迫，没有时间仔细探讨自动续期的条件，因而属于空白立法，需要将来予以补充，确定自动续期的条件。三是认为这一规定的内容是不确定的，也可能有条件，也可能没有条件，对此要看立法者的解释。

按照我在参加《物权法》立法过程中的印象，我认为上述三种意见都不够准确。在立法过程中，对此问题的绝大多数意见认为，这个问题关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需要慎重对待，目前以不作规定为好，留待将来根据实际情况再进行研究确定。因而，自动续期确定的，是不需业主申请即续期，以保证其不动产权利的行使；至于是否要有条件，是否缴纳出让金等问题，留待以后专题研究再行决定，而不是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处理。

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现行法律有的规定与《物权法》自动续期的不同。例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2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需要继续使用土地的，应当至迟于届满前一年申请续期，除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该幅土地的，应当予以批准。经批准准予续期的，应当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依照规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虽申请续期但依照前款规定未获批准的，土地使用权由国家无偿收回。”因此，目前有的拿该法的这一条文说事，是违反《物权法》第149条规定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对于《物权法》而言，是旧法，且《物权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与《物权法》规定相冲突的这一规定，是无效的，不能以这一规定对抗《物权法》第149条规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已经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感受。

“有恒产者有恒心”，是制定《物权法》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其实所谓“恒产”，并不是指房屋等建筑物，而是指土地，土地才是真正的恒产。《物权法》规定了永久性的房屋所有权，因而住宅等建筑物是准恒产，不解决住宅的土地权属的永久性问题，业主就不算有恒产，也就难说有恒心。在我国现行的土地公有的情形下，要想解决人民群众的恒心问题，就应当使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间是永久性的期间，只有永久性的期间，才能够使我国城市居民对自己的住宅有恒心，对国家的制度有恒心。在《物权法》第149条关于“自动续期”的规定上，已经初步确立了该物权的永久性基础，因为自动续期，就意味着永远都是在自动续期之中，就用了永久性。

在此基础上，解决有恒产者有恒心的问题是，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在续期时，是否要继续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问题了。对此，有两个办法：一是免费，将利益让给业主，也就是让给人民；二是费改税，不再收取出让金，而是对永久性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

权，权利人向国家缴纳税金，如同土地所有权的权利人向国家缴纳税金一样。如果采用这样的办法，就能够较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问题。

我的看法是，现在发生的20年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续期问题，将《物权法》第149条规定遗留的问题提前暴露出来，促使立法者面对这个问题，争取尽早解决，以增强人民群众对国家物权制度的信心。为此，在编纂民法典分则中，就有了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在把《物权法》进行整合、修订，编入民法典分则作为物权法编时，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不仅可以使这个问题一劳永逸地予以解决，而且还会给编纂民法典分则提供亮点，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

必须看到的问题是，在解决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续期问题，究竟应当采取何种办法解决的实质问题，就是怎样协调人民群众的利益与政府利益的平衡问题。如果仅从理论上分析，政府没有自己的利益，政府的利益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因为土地公有就是全民所有，土地增值，获益的是人民群众，因而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实际上并非如此，人民群众的利益总是具体的利益，是每一个业主对土地权属的利益，而政府的利益则比较抽象，是政府拥有更多可支配财产的问题。因此，政府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尽管是统一的，但是存在对立的方面。在这样的问题上，政府应当尽可能地让利于人民，让人民群众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在《侵权责任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在侵权人应当承担对受害人的民事责任与对政府承担的行政责任发生冲突时，优先承担民事责任，以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牺牲政府的利益。应当将这样的原则进一步扩展，延伸至对政府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协调中，一以贯之，就能够更好地造福人民，让人民群众获得更好的保护。

解读“土地使用权届满续租”

近期，因为温州土地续期问题，使得土地使用权年限问题引发了很大的关注。上期学术前沿，我们探讨了专家关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届满续租法律问题的观点，本期我们搜集了多位专家、学者对土地使用权届满续租的解读，整理成文，供领导参考。

自动续期到底收不收费？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程啸：自动续期是期限自动延长，跟重新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是两码事，在国家没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温州如果擅自收取土地出让金是违法的，没有法律依据的，重新签出让合同是与法律矛盾的。自动续期是不管当事人申不申请，政府让不让，期限都自动延长。我建议应该由国家立法机

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出台法律解释，因为这涉及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通过法律解释，明确自动续期的问题，免除人民群众担忧，同时防止地方政府违法行政。在国家没有规定可以收费之前，不能收费，否则就是违法的，这方面不存在创新问题。（网易财经 2016 年 4 月 24 日）

房屋自动续期不应由地方政府解释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学博士生导师**江平**：土地续期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法律解释，因为这个条款写在《物权法》上，对于物权法的解释资格当然是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具体说来也就是法工委。对于“自动续期”的含义，江平觉得至少有三点，第一点在“续期”，就是说明期满后以后，一不能够收回，二也不能够按照原有形式再来重新签订一个土地出让合同。第二点是自动续期。自动续期就说明业主不需要自己来申请，自动来续期，不需要主动提出和申请，这涉及到法律效率问题。第三，当初写的时候只写自动续期，并没有写有偿无偿，将来解释就非要说清楚。如果是有偿的，那要写明续期有偿要交费，那有偿交费到底多少。（新华网 2016 年 4 月 22 日）

土地使用权的理想方式是永久化 社科院法学家**刘俊海**：比较倾向于永久性的他物权，国家有所有权，个人有他物权。一方面国家所有权制度没有改变，显出以民为本的立法理念，且可能是一种利益多赢的选择。对开发商有好处，他买的土地是长期的，可以多赚一点；也体现了国家的人文关怀，这是福利国家的精神实质和标志，也创新了物权法制度。合理的土地制度可使民众对财产完整有可预期性，心里踏实，更能激发起社会责任感及对法制的信赖和敬仰，不失为寻求公平效率，个人与国家利益的平衡点。（新浪网 2016 年 4 月 22 日）

土地年限应改为永续制 中央党校经济学家**周天勇**：城镇国有土地的年期断崖等问题，实际上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唯一出路，在于使用年期的永续化。在国外，9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的土地产权都采用永久业权形式。即使有的国家早先规定了土地产权年期，但大多在随后的实施中采取办法予以延期。比如，以色列就曾从最初的 49 年被延长到 98 年，进而在 1997 年又被迫延长到了 196 年。农村集体土地国有化后，其使用年期，同样也应当永续化。农村和城郊原集体所有宅基地从农户长久使用，改革为永续使用，并可以继承，并确权认证；而对村中非农业的经营性用地和用房，则可按照农民土地股份的比例有股权，并且也是永续使用权，也可以继承。（网易新闻 2016 年 4 月 22 日）

尽早出台关于土地出让续期的实施细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汪丽娜**：目前，绝大部分地区住宅小区用地使用年限都是70年。但一些地方因为各种原因，确实存在低于70年的情况。目前，关于住宅用地使用年限续期的法律依据主要是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虽然物权法明确提出“自动续期”，但是由于缺乏细则，如何“自动续期”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来说难以操作。房屋是很多老百姓最大的财富。一些人拿出大部分的积蓄买房，房屋的增值不是因为房屋本身而是土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70年之后再交一大笔出让金显然不太合理，可以象征性交一点。在强调法治社会的今天，首先要坚持有法必依，严格落实物权领域的立法成果，增强人民群众对国家物权制度的信心；另一方面，针对物权法规定并不详尽的现实，通过充分吸取民意及规范的程序，尽早出台关于土地出让续期的实施细则，缓解公众焦虑。（荆楚网-湖北日报 2016年4月20日）

有四种方案解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龙卫球**：土地使用权自动续期需要立法解释。自动续期，缴纳土地使用年金，将一次性土地使用费转为年金，相当于房产税，以土地面积和建筑面积按照特定计税标准合计”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除了“年金制”的办法外，他还提出了另外三种方案：第一，自动续期，无需缴纳土地使用费，但地上物所有权发生灭失或重大改建则终止续期，此种情形当加强危房监管，以建筑法明确危房处理机制；第二，自动续期，但需一次性缴纳下一个期限的土地出让金，地上物所有人因此可以在新期限内，按照原有范围和标准改造或者重建地上建筑物；第三，自动续期，无需缴费，且无限期所有权化，回到类似1982年前城市宅基地所有权状态。当然，此种情形其实就是城市住房用地重新私有化。（民主与法制网 2016年4月24日）

信息快递

首季中国经济虚拟复苏 香港《信报财经新闻》4月30日报道，首季中国经济数据被认为亮眼，关键的经济增长率守住了官方所订目标，尽管领导人早漏口风，可望有个好开局。为换取经济增长，内地放水空前。首季银行系统放贷高达4.67万亿元，按年增约9300亿元；同时，社会融资增至6.59万亿元，按年多1.93万亿元。上述两条数创出历史新高，可见放水情急。这使得原本已多高的企业债务率攀至更高水平，而原本很低的居民债务亦迅速上升，且主要流向房地产加杠杆。首季中国经济似乎报喜，但喜中带出忧，推进经济长治久安的改革，暂且叫停或收缩，固然不合期望，而经济绕回旧路前行也莫不收一利而带出一弊，难免步步惊心。

中国贪污起刑点金额上调六倍 新加坡《联合早报》中文网 4 月 19 日报道，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 18 天公布贪污贿赂刑事案的司法解释。根据《解释》，当仅仅考虑数额时，贪污的定罪起点调高到 3 万元，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比 1997 年刑法规定的 5000 元起点上浮六倍。如果有较重犯罪情节，受贿数额最低至 1 万元以上，就可能受刑事处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指出，官员是否构成贪污受贿，根本无需探讨腐败数额是多少，应由行为的性质来决定，只要贪腐就应该零容忍。此外，设起刑点所带来可能导致严重问题与误导效应。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斯伟江指出，需要调整的不仅是数额，纪委和检察院的办案模式也需要调整。他认为，反腐力度的关键并不是决定于定罪数额的多寡，而在于是否形成权力监督、舆论制衡、正当制衡的机制，缩小官员、尤其是一把手权力寻租的空间，减少腐败的源头。

中国空气污染转向内陆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4 月 21 日报道，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整理的的数据，北京和上海等中国东部城市的雾霾正在减少，而中国内陆城市的雾霾却在加重。过去三年，中国富裕的沿海城市一直在大力整治空气污染，为煤炭的使用设定上限，并关闭附近的燃煤电厂。其结果是，在北京，曾以笼罩首都闻名的雾霾延续了近来的好转态势，2016 年头三个月 PM2.5 细颗粒物污染平均浓度同比减少 28%。根据绿色和平组织从城市空气监测站收集的数据，上海市的污染下降了 12%。不过，尽管两个城市的污染状况都有所改善，但它们录得的 PM2.5 平均水平都至少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建议的最大值每立方米空气 10 微克的六倍。总体上，355 个被调查中国城市的平均 PM2.5 水平比去年第一季度下降了 9%。尽管中国东部城市正变得清洁，这个成就是以其他城市为代价的。绿色和平组织表示，尽管毗邻北京的河北省关闭了多家燃煤电厂，但中西部省份出现了燃煤电厂建设增加的情况，“尤其是因为那里的空气污染和碳排放监管更宽松”。在被调查的城市中，91 个城市在过去一年的空气污染同比加重了。受到影响最严重的是中国的中西部，那里的 69 个城市空气污染平均上升逾 20%。

两岸今起协商合作打击电骗 香港《文汇报》4 月 21 日报道，按照《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机制有关安排，台湾方面由法务部门、陆委会、海基会等机构 10 名代表组成的代表团昨天抵达北京，将与大陆公安机关就两岸合作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有关事宜进行协商。代表团团长是台法务部国际及两岸法律司长陈文琪，中午抵达北京。协商小组初步规划，预定明日返台，针对肯尼亚案、马来西亚案及两岸共

同打击犯罪进行通盘协商，以了解陆方侦办进度及案情，争取人道探视在押的台籍欺诈疑犯，并商讨后续接返事宜，希望两岸能达成协议，对类似案件订立司法互助原则。

中国外汇储备5个月来首次增加 英国《金融时报》4月7日报道，随着人民币汇率下行压力减轻，上个月中国外汇储备出现自去年10月份以来的首次上升。根据中国央行发布的新数据，3月份中国外汇储备上升至3.212万亿美元。分析师原本预计，中国外汇储备会比2月份的3.202万亿美元低60亿美元。100亿美元的实际上升幅度尽管不算大，但它或许有助于减轻对中国外汇储备的担忧。在去年8月份中国央行公布新的汇率中间价机制之后，中国外汇储备曾急剧减少。当时，突然公布的消息令全球市场晕头转向，并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突然贬值。与此同时，人民币进一步贬值的预期也导致资金外流急剧增加。去年12月，该行再次作出了含混的表态，表示该行会令人民币汇率紧盯一个货币篮子。这一表态似乎加剧了资金外流，迫使该行花费中国更多外储，阻止人民币陷入进一步暴跌。

粤年底前实现 全省政务上网办 《香港商报》4月8日报道，广东省推广“一门一网式”政府服务模式改革昨日发布了最新实施方案。该方案显示，今年4月底前，佛山全市将率先实现与省府网上办事大厅无缝联接，该市经验复制到全省后，12月底之前，该省各地要完成政务办事上网一站式完成的改革。据实施方案显示，此次改革的一大亮点是拓展建设网上办事大厅统一申办受理平台，与部门审批系统无缝对接，变多网受理、多头受理为一网受理与一口受理。同时消除模糊语言、兜底条款，为群众办事提供清晰的指引，减少群众重复提交申请和到现场办理的次数。方案还提出，这种一门一网式政府服务模式将延伸到基层的村(居)。将在年底全面实现，群众办事即来即办，立等可取。广东省此项改革还明确提出，要坚决砍掉各类繁琐无谓的证明和手续。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和盖章环节，原则上一律取消。能够信息共享获取的有关信息，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供证明材料。办事人只要提供身份证号唯一标识，其历史办事数据可以重复利用，从源头上避免重复提交办事材料、证明和证件，杜绝各类“奇葩证明”、“循环证明”等现象。同时建立健全首问负责制度，一经查处违规行为会严肃处理。

深圳楼市调控初见成效 香港《经济通》4月8日报道，深圳房地产调控措施的降温效果明显。深圳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的数据显示，3月28日至4月3日，深圳一手住宅成交652套，成交面积约7.05万平方米，分别环比下滑16%和15.5%。

7%，这已经是深圳新房成交面积连续第五周下滑，与春节前的周成交量相比接近腰斩。对于未来房价预期，据《中国证券报》引述经济学家马光远认为，上海、深圳的房价已透支了全年的涨幅。而在调控周期下，整个市场预期已经出现明显逆转，同时很多具有购买能力但没有购房资格的人将退出市场，因此深圳、上海的房价不排除下跌调整的可能。但有房企负责人表示，由于地价高企，且前期大量成交所导致的开发商大量回款，短期内期望房价下降并不现实。

中国拟扩大以房养老试点 遇传统观念挑战 香港“凤凰网”4月6日报道，近日公布的发改委《关于2016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推进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保监会将在现有四个试点城市的基础上，选择经济条件较好、房地产市场较为规范、当地政府支持的城市和地区纳入试点范围，扩大业务经营区域。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住房反向抵押的养老模式在理论上讲是一件好事，在美国早就成为五个养老支柱之一，但在中国情况不一样，它遇到的是文化传统上的“水土不服”。“中国有三个特殊群体特别适合以房养老：独生子女国外留学就业的空巢家庭、独生子女国内异地就业的空巢家庭、失独老人群体。但是文化的力量是印刻在头脑里的。”郑秉文认为，以房养老在较长时期内还是个小众产品，要看到这个现实，要有长期准备。

江苏“营改增” 企业税负降低 台湾《联合报》4月13日报道，江苏省国税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夏敏12日在南京表示，今年5月1日“营改增”全面实施后，江苏房地产企业税负将大幅降低。江苏省政府在南京举行推进“营改增”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作上述表示。江苏省财政厅副巡视员沈益锋表示，“营改增”试点涉及江苏省建筑、房地产、金融、生活服务等4个行业84.3万户纳税人，预计今年减税500亿（人民币，下同）。这84.3万户纳税人中，涉及江苏建筑业纳税人25.85万户、房地产业纳税人2.92万户。江苏是经济发达省分。据官方数据，今年前两个月，江苏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1,161.5亿元、占全大陆的12.8%，比去年同期增长4.1%。江苏省地税局副局长张滢表示，营业税是江苏省地税系统第一大税种。去年，江苏房地产业完成营业税928.07亿元，占全省营业税收入的37.9%。据试点方案，房地产企业向政府部门支付的土地价款，允许按规定从销售额中扣除。“土地出让金占房地产项目成本比重很大。该举意味着减小税基，将大大减轻房地产企业税负。在上游企业增值税发票开票通畅的情况下，减负比例可能还超过30%。但是，这不能推导出房价一定会下降。”夏敏说。据夏敏表示，江苏省国税局对南京市房地产企业的测算显示，南京市房地产企业土地出让金占项目成本约为30%。

安倍：美军撤出日本“不可想像” 美国《华尔街日报》4月7日报道，在美国大选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对日政策也成为各竞选人趁机争取选票的法宝，美日关系备受关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5日罕见公开警告美国总统参选人，他坚持认为美日联盟有利于全球安全，并对“赤裸裸的民族主义”发出警告。安倍晋三表示，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应该维护现有的贸易协定，他还希望推动一个太平洋贸易协议，美国两党的总统候选人都认为该协议对美国不利。此前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曾提出美军撤出日本、让日本自行防卫的可能性。在被问及此事时，安倍晋三态度明确。他表示“在可预见的将来，出现不需要美国的存在的情况是不可想像的”。安倍表示，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安全保障相关法于上月在日本施行，称“日美同盟的强化使遏制力得到加强，这不仅是对日本，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作出贡献”。在谈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时，安倍晋三称，由此将诞生一个其本地生产总值（GDP）在全球GDP中占到40%的经济区，它受到自由及公平规则的保护；通过TPP，美国、日本和其他参与该协定的国家能够收获巨大利益和增长机会。日本将在5月底举办七大工业国（G7）领导人峰会，安倍晋三认为此次论坛将显示出领导人反对“赤裸裸的民族主义”行为的态度。

本资料所登言论不代表本编辑部观点，仅供党政领导和决策部门参考

责任编辑：吴健涛

本期编辑：何楚龙

校对：何楚龙

地址：城站路 85 号孝感市图书馆

电话：2823087

编辑日期：2016 年 5 月 19 日